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八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六年六月

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 兼論準噶爾遺產 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

馬子木*

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兵敗流亡巴達克山，西帕米爾地區由是進入清朝的關注範圍，清與巴達克山伯克蘇勒坦沙就引渡之事往還交涉，並逐漸在西帕米爾建立起權力與情報網絡，形成了與東亞宗藩秩序所不同的「主僕」(ejen-albatu) 政治關係。

西帕米爾地區的族群與文化均與清有較大隔膜，清朝在制度與知識上亦無足夠的準備以因應其西陲經略。準噶爾汗國長期統治天山南北路，地理上介乎清與西帕米爾之間，使其政治文化亦成為溝通二者的中介。清朝以準噶爾汗國的征服者與繼承者的面目出現於中央歐亞東部，基於實用主義的考量，繼承了準噶爾在人員、語文、政治邏輯諸方面的遺產，構成其中亞外交得以展開的基礎。惟此不過為一時權宜之策，隨著與中亞諸國接觸之頻繁，高宗逐漸調整治理思路，蒙古因素在中亞外交中的壟斷性地位逐漸淡化，滿、漢等多元影響因素亦滲入其中。

本文利用滿漢文檔案與史籍，考述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與巴達克山交涉始末，並試圖檢視清朝權力網絡在此地區內的建立過程，及其所憑藉的知識資源、行政策略及政治文化傳統，以期為理解清與中亞關係史及清朝「天下秩序」在中亞的構建提供一個具體的角度。

關鍵詞：巴達克山 大小和卓 清代外交 準噶爾汗國

*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XNH028。

一・緒言

清朝在滅亡準噶爾汗國、平定天山南路前後，陸續與中亞諸國家、部族如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巴達克山、博洛爾等建立了聯繫，在清朝看來，即是「和通諸部，次第偕來」、「王師所過，萬眾傾心，呼籲投誠，爭先恐後」。¹ 位於瓦罕走廊西側的巴達克山地處葉爾羌聯通中亞的主要商路之上，² 與正在崛起的杜蘭尼王朝接壤，又因大小和卓逃亡至此而較早與清朝接觸，且周邊小國林立、紛爭不已。西帕米爾地區諸多政治力量在此交匯，其內部政治關係尤為複雜。相較而言，清朝對帕米爾以西的伊斯蘭世界較為陌生，此先既無外交經驗、又乏知識貯藏，如何在此區域內確立「大國」（滿文 *amba gurun*）的權威，進而確保西陲的安定，無疑是清朝邊疆行政的重點。

清與中亞關係史廣義上應屬於清代對外關係史的範疇，最近三十年來，學界已對「朝貢體系」的模式進行了大量完善、修正乃至挑戰。³ 不過，討論主要基於研究日趨成熟的東亞外交史，較少關注到中亞經驗的特殊性。關於清與中亞關係史的先行研究，大體可分為兩類。其一是通論性質的概說，傅禮初 (Joseph Fletcher) 與 Morris Rossabi 在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總括式研究皆屬開創之作。⁴

¹ 傅恆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500冊），卷四四，〈藩屬・序〉，頁831。

²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vol. 1, pp. 32-33.

³ 較新的研究如 Brantly Womack 基於中越關係史提出所謂「不對稱關係理論」(asymmetry theory)，即雙方在相對權勢上有明顯差別，且優劣地位不易轉換，強者亦無法消滅弱者，由此使這一關係長期延續；趙剛對重開海禁至一口通商期間清朝海外貿易政策的重新考察，對清漠視、封鎖海外貿易的舊說多有質疑，參見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8; Zhao Gang, *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 Chinese Maritime Policy 1684-17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此外如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高明士的「天下秩序」、黃枝連的「天朝禮治體系」以及岩井茂樹、廖敏淑對互市、通商制度的強調，均屬對「朝貢體系」理論的修正。

⁴ Joseph F.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Aldershot: Variorum, 1995), part 2, pp. 206-224;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5), pp. 166-191.

米華健 (James Millward) 曾對清與中亞外交關係的實質及「朝貢」之有無有所申論；小沼孝博則從文書交流與文本翻譯的角度考察了清與中亞諸國的關係及雙方互相的認知。⁵ 其二則是與特定國家的外交史個案研究，學者關注較多的是浩罕與哈薩克。潘志平、Laura Newby 皆有專書利用多語文史料對一七五〇年代至十九世紀晚期的清與浩罕關係進行討論，前者對基本史實如浩罕伯克統系、張格爾問題等作出詳細梳理，後者則基於清代外交的整體框架，考察「普世主義」(universalism) 的消逝，及隨之而來的從「邊疆」(frontier) 到意指更加明確的「邊界」(border) 的轉型。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均藏有道光年間浩罕察合台文來文，前者分別由潘志平、濱田正美考釋，後者則由唐屹、小沼孝博、新免康、河原彌生先後發表了轉寫、翻譯及詳細註釋。⁷ 早期關於哈薩克的研究多限於清—哈貿易關係，近年小沼孝博、野田仁對文獻考釋與政治史層面用力尤勤，二人合作發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托忒文、察合台文哈薩克阿布賚汗呈文的謄錄、轉寫、英譯與註釋。⁸ 小沼孝博有數篇專文討論乾隆朝清—哈政治關係，涉及緝捕阿睦爾撒納的交涉、清與哈薩克的「ejen-albatu」關係以及一七七〇年代前後對哈薩克政策的變化諸問題。⁹ 近年又有專書討論清朝平準

⁵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3; Onuma Takahiro,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Saksaha* 12 (2014): 33-48.

⁶ 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L. J.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 (Leiden: Brill, 2005).

⁷ 北京藏本見潘志平、蔣莉莉，〈1832 年清與浩罕議和考〉，《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 (1988)：87-102；濱田正美，〈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コーカンド關係文書 9 種〉，《西南アジア研究》68 (2008)：82-111。臺北藏本見 Tang Ch'i, "Two Diplomatic Documents From the Khokend Khanate to Ch'ing Empir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50 (1984)：1-47；小沼孝博、新免康、河原彌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 1848 年兩件浩罕來文再考〉，《輔仁歷史學報》26 (2011)：107-139。

⁸ Noda Jin and Onuma Takahiro, eds.,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Tokyo: Department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⁹ 小沼孝博，〈ヌサン使節の派遣：1757 年における清とアブライの直接交渉〉，《アジア文化史研究》14 (2014)：1-20；〈清朝とカザフ游牧勢力との政治的關係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エジェン—アルバト」關係の敷衍と展開〉，《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2 (2006)：39-63；〈1770 年代における清—カザフ關係——閉じゆく清朝の西北邊疆〉，《東洋史研究》69.2 (2010)：315-348。

後對準噶爾的統治政策、清朝與哈薩克關係的建立、十九世紀早期西部邊疆形成等問題。¹⁰ 野田仁則在清—俄關係的框架內考察清與哈薩克的交涉，其關注時段大體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曾撰文討論清、俄貿易政策的不同及雙方在哈薩克力量的消長、清朝對哈薩克汗位承襲的涉入等問題。¹¹

但關於西帕米爾地區的巴達克山、瓦罕、愛烏罕（阿富汗）與清朝的關係，先行研究鮮有涉及。佐口透基於漢文史料特別是《平定準噶爾方略》詳細梳理了此過程，並附帶討論了巴達克山在一七六〇年代前後與周邊部族的糾紛，是目前唯一專論此問題的著述。¹² 馬世嘉 (Matthew W. Mosca) 《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雖以清朝朝野對英屬印度的理解為中心，但亦涉及準噶爾汗國崩解後的中亞格局。作者留意到，清朝平定新疆引起了杜蘭尼王朝艾哈邁德沙的注意，後者試圖征服巴達克山，並向清高宗宣示其在中亞的武功。¹³ 但因非作者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仍屬一般性簡要敘述。另需說明的是關於巴達克山本地史的研究，目前僅有的成果均限於一七五〇年或十九世紀中期以降，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的巴達克山史仍屬空白，其史實的重建仍有待於清朝文獻的發掘。¹⁴

總體而言，關於清朝與西帕米爾地區的外交關係目前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仍留有大量空白。近年滿文與波斯文文獻的刊佈、整理提供了新的史料，¹⁵

¹⁰ 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國の辺境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4）。

¹¹ 野田仁，〈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露清貿易とカザフ草原〉，《東洋史研究》68.2 (2009)：358-388；〈清朝によるカザフへの爵位授與：グバイドゥッラの汗爵辭退の事例（1824年）を中心に〉，《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1 (2006)：33-56；《露清帝國とカザフ＝ハン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

¹² 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二章，〈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分裂〉，頁74-120，特別是頁74-88。

¹³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0-83.

¹⁴ 近年 Nourmamadcho Nourmamadchoev 對前近代巴達克山歷史與宗教關注較多，其博士論文即與此有關，參見 “The Ismā‘īlīs of Badakhshan: History, Politics and Religion from 1500 to 175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4)。

¹⁵ 本文所用滿文檔案主要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錄副奏摺》及《滿文寄信檔》，前者有關新疆、中亞史料已編為《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後者已整理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若試圖重構朝廷決策的全過程，滿文《上諭檔》、《議覆檔》與《宮中檔滿文硃批奏摺》亦需要參看，由於原檔無從查閱，且錄副、寄信檔存世者亦有殘缺，必須參酌《清高宗實錄》、《平定準噶爾方略》加以梳理。

特別是此前晦暗難明的細節因此而昭然，但滿文檔案究屬零散殘缺、缺少編次，波斯文史籍則成書較晚，事出追述，且多有誇飾，因此須以漢文史籍參酌互證、釐清貫通。本文即試圖檢視清朝權力網絡在此地區內的建立過程，及其所憑藉的知識資源、政治文化傳統以及具體的行政策略。從邊疆出發考察這一問題，一方面可以檢視清朝外交政策與行政體制在邊緣地區的運作實態，另方面亦不失為理解乾隆朝政治史與政治文化史的一個面向，因邊疆問題的走向時時受到中樞決策的影響，邊緣研究固無法迴避與遺忘「中心」層面的關照。

二・地理沿革與知識譜系

相對中原而言，地理位置上處於邊緣的內陸歐亞地區在帝制時期的官方地理學中亦始終處於敘述的邊緣。當清朝在一七五〇年代前後開始與中亞進行外交交涉時，對清朝而言，熟悉（或再熟悉）這一在官方地理學中幾乎是空白的地域尤為重要。本節在敘述巴達克山—瓦罕地區地理沿革的同時，嘗試通過知識史的脈絡，考察在一七五〇年代清朝威權正式滲入中亞之前，此一地區及其民眾是如何被想像、建構與書寫／圖繪的，以及官方地理學與士人敘述的互動過程。

（一）中亞歷史地理的遺產

巴達克山位於阿姆河上游的噴赤河流域，地跨今阿富汗東北部與塔吉克斯坦南部。其東部的瓦罕走廊，恰好連通塔里木盆地與興都庫什山地區，西域南道由喀什跨越蔥嶺，經此可向西南進入印度次大陸，或向西北深入中央歐亞腹地，在絲綢之路早期即已是重要的交通線之一。¹⁶ 此地在貴霜帝國時期本為五翕侯的故地，貴霜帝國衰落後，嚙達帝國又於五、六世紀之交征服了吐火羅斯坦全境。中土漢文史料對此一地區並不陌生，《魏書·西域傳》記有所謂「弗敵沙」國，「居山谷間」，沙畹、白鳥庫吉先後均將之勘定為巴達克山，沙畹並認定《北

¹⁶ 瓦罕走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早期漢文文獻中的記述，參看 M. 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 1, pp. 60-62. 托勒密《地理志》述幼發拉底河流域至 Serica（絲國即漢朝）的行程，即由 Bactria 向東跨越 Comedon 山至石塔而接入西域南道，Bactria 即巴克特里亞（大夏）地區，Comedon 山一般認為在瓦罕，石塔即蒲犁國，參看余太山，〈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氏著，《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213-214。

史》中所說的嚙達都城拔底延亦是巴達克山之對譯。¹⁷ 前說目前已得到公認，而後一種勘同已由馮承鈞指出其誤。¹⁸ 根據松田壽男的研究，包括弗敵沙在內的《魏書·西域傳》前五十二國的記述當出自董琬西使的報告，¹⁹ 易言之，最早在四三〇至四〇年代，中土即對此區域有了初步的印象。其後更為直觀的記述來自於玄奘：

鉢鐸創那國……山川迤邐，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²⁰

鉢鐸創那即巴達克山。同時僧傳中亦出現了巴達克山的異譯「波多叉拿」。²¹ 雖然巴達克山為商旅、僧人往來的必經之路，唐朝亦於龍朔元年（661）設立苑湯州以羈縻之，但在官方文獻所構建的地理世界中，對此區域的印象事實上是相當模糊的，在《唐會要》、《舊唐書》等官修文獻中，對巴達克山周邊地域並無清晰的記述，《魏書》中的概貌與玄奘身履目擊的見聞都未被整合入官方的地理世界之中。

中古時期巴達克山的統治者出自何種族群，目前尚不可知。根據阿拉伯史料的記述，突厥—葛邏祿人在前伊斯蘭時代即占領了巴達克山。²² 一二一八年，被蒙古大軍追擊的乃蠻王子曲出律由喀什噶爾向西南逃入巴達克山地區，隨即在巴達克山與瓦罕的交界地區被殺。²³ 這在蒙古文與波斯文史料中都有詳細的記述，

¹⁷ 沙畹撰，馮承鈞譯，〈大月氏都城考〉，馮承鈞編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36；白鳥庫吉撰，王古魯譯，〈西域史的新研究〉，王古魯編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頁56。

¹⁸ 此由馮氏譯註沙畹《宋雲行紀箋註》時指出，參見沙畹撰，馮承鈞譯，〈宋雲行紀箋註〉，馮承鈞編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27。

¹⁹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增補版）》（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頁166。

²⁰ 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一二，〈鉢鐸創那國〉，頁971。

²¹ 釋道宣，《續高僧傳》（收入《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據磧沙藏本影印），卷二，〈達摩笈多〉，頁115。

²² 巴托爾德，〈塔吉克人歷史概論〉，加富羅夫編，《中亞歷史：巴托爾德文集第2卷第1冊第1部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頁509。

²³ 姚大力，〈曲出律敗亡地點考〉，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20-231；Michal 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80-84.

如果考慮到阿拉伯世界發達的地理學撰述傳統，可以說對於蒙古人與阿拉伯人而言，巴達克山都不是一個陌生的區域，雖然後者地理撰述中的記錄未必完全準確。²⁴ 但在漢文歷史編纂的傳統中卻極少注意此地，元文宗朝修《經世大典地理圖》繪有巴達克山（元譯「巴達哈傷」）並不確切的相對方位；至明初修《元史》時，摘錄《經世大典圖》中地名作為「西北地附錄」列於〈地理志〉之後，其位置、政統、風俗一概闕如。²⁵

明朝開國後，太祖、成祖皆曾遣使帖木兒帝國，成祖並嘗試修復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互通貿易。永樂六年（1408），成祖遣內官敕諭八答黑商（即巴達克山）開通商路，「凡遣使往來，行旅經商，一從所便」。²⁶ 恰在此年，《永樂大典》纂修告成，前舉《經世大典圖》即被收入，就此而言，明廷似應繼承了元朝官方中亞地理認識的遺產，對中亞諸國方位、風俗乃至內部事務均有所瞭解。十八年（1420）正月，八答黑商使臣出現在新正朝賀典禮上；六月又遣使貢馬。不過在明朝的公文系統中，巴達克山的對譯很快由八答黑商變為把丹沙，景泰三年（1452）、七年、成化十九年（1483）、弘治三年（1490）等年，在與撒馬爾罕、哈密、吐魯番等共同進貢的使團中即出現了「把丹沙地面」，而在《高昌館課》中亦收有「把丹沙地面」（badanxa yir yangak）馬哈麻之進貢表文。²⁷ 顯然明朝朝廷確知「把丹沙」即是「八答黑商」之異譯，《明會典》將八答黑商列為「西戎」朝貢諸國。²⁸ 在朝廷所建構基於朝貢的「四夷」秩序下，值得關注的是士人群體如何認知、想像巴達克山。筆者找到明代士人對巴達克山最早的記述來自於鄭曉《吾學編》：

²⁴ 關於古典時期阿拉伯地理學著作中有關巴達克山的描述，參看 X. de Planhol, D. Balland and W. Eilers, "BADAḲṢĀN,"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III, fasc. 4, ed. Ehsan Yar Shat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9), pp. 355-361.

²⁵ 盛博編，《宋元古地圖集成》（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8），〈經世大典地圖〉，第2冊，頁828-829；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錄〉，第5冊，頁1567。關於《經世大典圖》中巴達哈傷位置錯訛的批評，參看丁謙，《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刻本），卷一，〈巴達哈傷〉，頁4b。

²⁶ 《明太宗實錄》（收入《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第2冊），卷八一，永樂六年七月丁未，頁1242。

²⁷ 《高昌館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第6冊），頁293。

²⁸ 萬曆《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據萬有文庫排印本影印），卷一〇七，〈禮部六十五·朝貢三〉，頁581。

八答黑商，永樂間遣使四十人來朝貢，……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樸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大抵皆羽毛、織文、玉石、香木、駝羊也，布帛銀錢皆可交易。²⁹

鄭曉並未說明其來源，不過就其側重於記敘貿易而言，其源頭很可能是商人社群，這種敘述亦符合朝貢體系之下「中土」對「四夷」物產的關注。其後《武備志》、《咸賓錄》、《諸夷考》都基本照錄了鄭曉的敘述，可以認定這是明朝精英階層對巴達克山的一般認知。³⁰ 若較之日用類書所反映出的民間社會將「諸夷」與「山海異物」並列、旨在獵奇、近乎神話式的異域想像，士人階層的記述仍顯出相當理性與平實。³¹ 不過就其承載的地理知識而言，實是一個斷裂的、非線性的地理知識譜系，易言之，此種知識在產生之時並沒有參照業已形成的文本，所敘說的僅是共時性的巴達克山概況，而非動態的、歷時性的巴達克山史，明朝士人的中亞認知與書寫大體均遵循這一模式。這可由兩方面稍加申說。其一是先代典故的缺失。從《魏書》之弗敵沙到唐朝鉢鐸創那、波多叉拿這一譜系事實上是乾嘉考據學到近代學術所逐漸綴聯而成，無可深責明人；但如前所述，明初對「巴達哈傷—八答黑商」這一譜系無疑是清楚的，而並未被整合入士人的地理知識體系之中，明人撰述的「四夷」文本完全失去了傳統史地書寫中對沿革的重視。其二是對本朝故事的忽略。即如中亞世界的伊斯蘭化，永樂中出使中亞的陳誠已經留意到哈烈 (Herat) 「有通回回本教經義者，眾皆敬之，名曰滿刺，坐立於眾人之右，雖國主亦皆尊之，凡有祠祭，惟滿刺誦經而已」。³² 陳誠之書雖未經刊刻，但仍有抄本流通，並非稀見；顯然其未被整合入士人階層的地理知識體系中，鄭曉及其後的作者並未參考，仍模糊地將中亞諸國視為佛教國家，這一誤解甚至延續到清初纂修《明史》。此外，明人並未將景泰以後新出現的異譯

²⁹ 鄭曉，《吾學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25冊，據明隆慶元年刻本影印），卷六八，〈皇明四夷考卷下〉，頁206。

³⁰ 茅元儀，《武備志》（收入《和刻本明清資料集》〔東京：汲古書院，1974〕，第6冊，據寬文四年刻本影印），卷二三五，〈四夷十三〉，頁2572；羅曰鑒，《咸賓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四，頁105；游樸，《諸夷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42冊，據明萬曆二十年刻本影印），卷一，頁439。

³¹ 日用類書中的地理世界如《五車拔錦》（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99-2004〕，第1冊，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曆丁酉刻本影印），〈諸夷門〉，頁187-246；《妙錦萬寶全書》（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12冊，據建仁寺兩足院藏本影印），卷四，〈諸夷門〉，頁209-278。

³² 陳誠撰，周連寬校註，《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一，〈哈烈〉，頁69。

「把丹沙」與早已熟悉的「八答黑商」聯繫起來。這與前述沿革地理的缺失共同構造出一個共時性的、斷裂的文本。易言之，在知識精英的地理世界中，對作為朝貢國的中亞只有一個模糊而凝滯的「異族」印象，前代舊籍承載的「文本知識」與來自傳聞的「經驗知識」並不對等，四夷文本的書寫更倚重於後者，因而形成了「四夷志」靜態的、非線性的文類特質。事實上，直到清朝平定準噶爾汗國後，「文本知識」才在朝廷文化工程與學者社群的合作之下逐步建構出完整的譜系脈絡。

（二）清朝中亞圖景的成立

十六世紀末，葉爾羌汗國征服了巴達克山地區。至十七世紀，隨著準噶爾汗國的興起，衛拉特人的力量逐漸滲入中亞東部，噶爾丹曾兩度西征，遠至費爾干納；噶爾丹策零時期，準噶爾大軍深入中亞腹地，迫使巴達克山、浩罕等國臣服，並貢納質子。³³ 同一時期，清朝對準噶爾汗國的西征亦有所聽聞，在滅亡準噶爾汗國之前，來自俄、蒙以及穆斯林社會等多方面的正式或非正式情報使得清朝得以不斷充實其中亞地理圖譜，而這使清朝在一七五〇年代真正進入中亞時，對此一文化與族群上皆有相當隔膜的地域，在地理上反不致有較多的疏離感。

清朝入關後，向來承認明朝宗主權但事實上處於獨立地位的哈密衛很快宣布歸順清朝，順治十三年（1656），吐魯番衛亦「向化來貢」。³⁴ 在準噶爾汗國覆亡前，哈密—吐魯番一線始終是雙方對峙的前線，特別是哈密地方，尤為清、準爭奪之焦點，截至康熙末年，清朝實際控制範圍的西陲亦僅至於哈密而止。不過官方地理學知識世界的範圍卻並不以此為止，對於廣袤的西域乃至中亞世界，清朝仍有一個大體的認識。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聖祖收到俄羅斯來文，諭大學士等曰：

其國距京師甚遠，從此陸路可直達彼，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日至土魯番，土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土魯番即是鄂羅斯之境。聞其國遼闊二萬餘里，漢時張騫曾出使西域，或即是彼處地方。³⁵

³³ 魏良弢，《葉爾羌汗國史綱》（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頁90-92；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上冊，頁84。

³⁴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第28冊，A28-95號，順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禮部題，頁B15939。

³⁵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本影印），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第4冊，頁2143-2144。

此段論述中的謬誤自可置不論，不過據此可知，在當時的地理知識世界中，哈密、吐魯番某種程度上是作為一種「界標」，由此以外即是「大國」不屑亦不必要過多關注的、尚未完全開化的「藩服」，朝廷的職責即是安靖這一界標以內的地區，「總之中國安寧則外蠻不作」。³⁶ 三十六年（1697）五月，聖祖在宣示平準功成時，談及準噶爾汗國在天山南路與中亞的擴張：

噶爾丹曾破回子中之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欽、哈思哈爾、賽拉木、吐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餘城，乃習於戰鬥之國也。³⁷

在所列舉的地名中，有塔里木盆地北緣的阿克蘇（賽拉木）與南緣的葉爾羌（葉爾欽）、喀什噶爾（哈思哈爾），亦有遙遠的布哈拉汗國（布哈爾）。清朝從何得知準噶爾汗國的軍事擴張活動，限於史料，目前尚不得而知。而就在此前一月，聖祖亦曾有類似的表述：「初，噶爾丹吞併吐魯番、葉爾欽、薩馬爾漢、哈薩克等千餘部落，本朝並不之問」，³⁸ 是時噶爾丹已故、策妄阿拉布坦方與清朝通好，哈密亦得到清朝的冊封，長期對立所造成的邊境危機已大為緩和，聖祖很可能即是在班師途中自準噶爾降人處聞知相關情報。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策妄阿拉布坦與清朝反目之前，哈密—吐魯番一帶局勢相對穩定，而清朝對於中亞的地理認知也在此期間大為展拓，這主要體現於《皇輿全覽圖》中。

《皇輿全覽圖》的測繪過程與參與人員，先行研究已有較為充分的討論，本文不復贅述，需要重新檢視的是此圖關於西北邊疆的繪製。³⁹ 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一七三〇年代在所著《中華帝國全志》中曾據在華耶穌會士書簡概述了《皇輿全覽圖》歷時十年之久的測繪過程，並逐一列出了 631 處實地測繪點的地名與坐標。一九八〇年代初，葛劍雄節譯了杜赫德書相關篇

³⁶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4 冊，頁 2146。

³⁷ 馬齊等纂，《清聖祖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大紅綾本及故宮博物院藏小紅綾本影印〕，第 4-6 冊），卷一八三，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頁 964。

³⁸ 馬齊等，《清聖祖實錄》卷一八三，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寅，頁 955。

³⁹ Cordell D. K. 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80-185.

章，後來研究此圖的學者最常參考的即是此篇譯文。⁴⁰ 葛譯本限於篇幅，僅列出實地測繪點的四至。覆案原書，在「西韃靼」(Tartarie Occidentale) 地區有 93 處測繪點，在西 20°（以京師所在為子午線）以西者有 6 處，分別為 (1) Ourtou (北 44°50'，西 21°38')、(2) Soroto anga (北 44°54'，西 22°25')、(3) Ourgouftai poulac (北 44°12'，西 21°43')、(4) Ourtou poulac (北 44°48'，西 20°21')、(5) Aftane hotun (北 43°2'，西 22°48')、(6) Hami hotun (北 42°53'，西 22°23')。⁴¹ 其中第 (5) 處 Aftane 城是實測最西點，《皇輿全覽圖》與《雍正十排圖》在哈密西北的交通線上均繪有 astak 城，漢文寫作「阿斯塔納」，⁴² 當即此處。《全覽圖》西端至拉達克西側的 bidi hembo 山嶺（西 44°），西北方向亦繪至西 39°左右的伊犁河谷，自哈密向西約有 17 個經度的地區，皆非傳教士勘測所至。如細覽這一區域的地圖，繪製詳略不同，其詳者山川、村落、城鎮、交通線皆有標識，如僅僅依據口述材料，恐無法做到如此的精細程度。其中天山南路庫車、阿克蘇、喀什噶爾、葉爾羌一線皆有繪製，事實上，《全覽圖》的繪製者當參照了已經存在的若干舊圖，據法國耶穌會士蘇熙業 (E. Souciet) 所述，他曾擁有若干幅由哈密到策妄阿拉布坦駐地哈卡斯的地圖，其中一幅是清朝使臣所繪，而他正是根據此圖才定出吐魯番、伊犁河上游和巴爾喀什湖等的地理位置。⁴³ 筆者推測，這些舊圖很有可能即是準噶爾汗國所繪製。世傳所謂雷納特 (Renat) 一號圖的存在足以說明準噶爾汗國具有較為成熟的地圖繪製技藝，且在準噶爾汗國覆亡後，高宗一度命人尋找準噶爾舊地圖與繪圖匠人，亦可為佐證。

準噶爾汗國之外，另一重要的知識來源是俄國。⁴⁴ 俄國在十七世紀中葉已與希瓦、布哈拉等汗國建立外交聯繫，而在與《全覽圖》同時的俄國地圖上，已繪

⁴⁰ (法) 杜赫德撰，葛劍雄譯，〈測繪中國地圖紀事〉，《歷史地理（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206-212。

⁴¹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édouce*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6), vol. 4, p. 603.

⁴² 傅恆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圖考一·安西北路圖一〉，頁 109。

⁴³ (英) 約·弗·巴德利撰，吳持哲等譯，《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上卷第 1 冊，頁 354。

⁴⁴ 清宮舊藏有俄文俄羅斯地圖兩幅，附有滿文簽釋，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頁 26。由於未見原圖，不知其年代與來源。

有中亞主要國家／族群的分佈。⁴⁵ 盛清早期對俄國中亞地理學的借鑒可以圖理琛的《異域錄》為例略加申說。圖理琛一行前赴土爾扈特途中，俄國西伯利亞總督噶噶林曾向其講述中亞的各大政治力量：

觀天下諸國，沙障汗 (šajang han)、恭喀兒汗 (gungg'ar han)、西費也斯科國 (sifiyesk'o)、厄納特赫國 (enethe)、哈薩克國 (hasak)、哈拉哈兒叭 (hara halbak)、策旺拉布坦 (ts'ewang rabtan)、阿玉氣 (ayuki) 等國，皆互相爭鬥。⁴⁶

根據學者的考釋，沙障汗即是印度莫臥兒帝國全盛期的皇帝 Shah Jahan（意為世界之王），西費也斯科國是瑞典，厄納特赫是印度，恭喀兒汗當指奧斯曼帝國，hara halbak 是烏茲別克的卡拉卡爾帕克人。⁴⁷ 而在離開俄羅斯之前，圖理琛又記下了「南面所有諸國部落名目」：

土爾虎特 (turgūt)、哈拉哈兒叭 (hara halbak)、哈薩克 (hasak)、策旺拉布坦 (ts'ewang rabtan)、布魯特 (burut)、莽武特 (manggūt)、布哈爾 (buhar)、哈薩兒巴什 (hasal baši)、伊爾欽 (irkin)、哈什哈兒 (hasihar)、庫策 (kuce)、阿克蘇 (aksu)、吐爾們 (turamun)、沙障 (šajang)。⁴⁸

此段涉及的地域甚廣，基本涵括了中央歐亞的各大政治力量。而從《異域錄》卷首所刊的地圖來看，雖然繪製極為抽象，但圖理琛顯然瞭解其大致方位，其從俄方所獲得的地理知識，非僅地名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底，高宗命廷臣整理造辦處輿圖房所藏輿圖，編目清單中有「禿爾古忒阿岳啓慝俄羅斯地輿圖一張」，⁴⁹ 係「康熙伍拾肆年參月貳拾柒日奉旨交來」，⁵⁰ 就時間

⁴⁵ 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1998): 277.

⁴⁶ 圖理琛撰，今西春秋校註，《校註異域錄》（奈良：天理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1964），頁362，滿文見頁257。

⁴⁷ 圖理琛，《校註異域錄》，頁107-108，注釋113-114, 116。關於gungg'ar的考述，另參小沼孝博，〈「控噶爾國」小考：18至19世紀歐亞東部奧斯曼朝認識之一端〉，《民族史研究（第八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頁153-163。

⁴⁸ 圖理琛，《校註異域錄》，頁352-353，滿文見頁281。

⁴⁹ 《宮中檔硃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4-01-38-0023-019，呈造辦處輿圖房挑下各圖名目數目清單。

⁵⁰ 《天下輿圖總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未公開，承志教授賜示抄件，特致謝忱。雍正九年四月初九日都統滿泰進《吐爾古忒厄羅思輿圖》一張，當亦與圖理琛使團有關，參見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國の形成と八旗社會—》（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9），頁274。

而言，很有可能即是圖理琛使團返回後所繪製呈覽。

康熙《皇輿全覽圖》帕米爾以西繪至安集延，並繪有自喀什噶爾西向至安集延的交通線，途中經過 ici margan、artus、cebasaltai、toin dube、suk、icu taši、kara sakal、kara kūlja、asagun、korgon dube、k'ok bulak 等處。而葉爾羌西南越帕米爾山脈後則完全空白，僅標註有戈壁兩處，並用山脈示意大致描摹出瓦罕走廊東北的地形概貌。⁵¹ 雍正五年（1727）秋繪成的十排《皇輿圖》（以下簡稱《十排圖》）收錄地域遠較康熙《皇輿全覽圖》為廣，極西繪至黑海（sahaliyan muteri）與地中海交匯處，可見此間十餘年清朝官方地理學對中亞認知的擴展。⁵² 不過此時其中亞地理知識譜系仍是相當模糊，圖中自喀什噶爾以西註記較少，保留有大量空白，今阿姆河、錫爾河流域標註有若干城名，在西 43 至 44 度、北 4 至 5 度間標有「哈拉哈兒叭駐地」（hara halbak tehe ba），⁵³ 此正是圖理琛自俄國聞知的「南面諸國部落」之一。就本題所討論的地域而言，《十排圖》所繪與《皇輿全覽圖》大抵相同，即喀什噶爾—葉爾羌地帶向西跨越帕米爾高原後，僅標註有通往安集延的交通線，而自西 36 度、南 1 度向西南至西 44 度、南 7 度的地域基本留白。

除官方地理學外，尚需討論的是清朝治下的漢人如何想像與理解這些僅見於舊史的地域，以及五世紀以降漢文歷史編纂中、特別是明代公私記載中遺留的大量有關巴達克山地區的描述，是否融入到清朝官方地理學的知識譜系之中。全面檢視此問題非本題所能涵括，但若粗檢清人撰述，可知在西征結束前，《皇輿全覽圖》與雍正《十排圖》所反映的清朝官方地理學體系與精英士人階層的知識世界截然兩途，後者更多的是簡單繼承、襲用明代史籍的舊文。正如學者所論，《全覽圖》與《十排圖》深藏秘府，頗具機密性，極少有士人得以參閱，故其對同時代國內的地理學敘述與製圖技藝鮮有影響。⁵⁴ 米華健甚至認為，對於無從接觸到輿圖的清初士人而言，其對西域的觀感大多來自於漢唐舊史、筆記、僧侶遊

⁵¹ 康熙《皇輿全覽圖》四排六號，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第 1 函，散裝無頁碼。

⁵² 雍正《皇輿圖》的繪製年代，參看於福順，〈清雍正十排《皇輿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12：74。

⁵³ 雍正《皇輿圖》五排西六圖（列數序號係該書編者所加），汪前進、劉若芳，《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第 2 函，無頁碼。

⁵⁴ Yee,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 p. 187.

記、詩賦乃至通俗小說如《西遊記》。⁵⁵ 其所論並不確實，這些文類固然是清初士人關於西域、中亞的知識來源，但更為重要的是明朝四夷文本的影響，清初士人知識世界中對中亞的認知可以說是明朝四夷書寫的直接延續，茲以相關文本的襲用與傳布為例稍加申說。萬曆八年（1580），時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王宗載「搜輯往牒，參稽國朝故實」作《四夷館考》，⁵⁶ 其中回回館目下列有撒馬兒罕、天方、吐魯番三條，分別記錄其地理、風俗及與明朝的進貢關係，其文字基本襲用鄭曉《吾學編·四夷考》，是明朝士人典型的四夷文本書寫。⁵⁷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太常寺少卿江縈輯錄《四譯館考》，除在卷首添入順治年間吐魯番朝貢事例外，皆用王氏舊文，⁵⁸ 即向達所謂「擷摭宗載書而成」。⁵⁹ 與《四夷館考》類似的還有〈西域土地人物略〉，此篇出自嘉靖《陝西通志》，記錄嘉峪關向西經行地點、里數，並夾註風俗，清初顧炎武將之抄入《天下郡國利病書》，康熙中葉梁份纂輯《秦邊紀略》亦編入卷尾。⁶⁰ 明代士人有關四夷的論述由此進入清初的士大夫知識世界中。

康熙二十年（1681），正在京師參與纂修《明史》的尤侗撰寫了百餘首〈外國竹枝詞〉，其中撒馬兒罕一首云：

鬱金香散佛頭開，國寶世傳照世杯。嘉峪關前旗鼓盛，中官迎得獐狻來。⁶¹

⁵⁵ James A. Millward, "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2 (1999): 66.

⁵⁶ 王宗載，《四夷館考》卷首自序，引自向達，〈記巴黎藏本王宗載《四夷館考》〉，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 656。按此序通行東方學會校印本《四夷館考》缺。

⁵⁷ 王宗載，《四夷館考》（民國十三年東方學會校印本），卷上，〈回回館〉、〈撒馬兒罕〉各條，頁 10b-11b。

⁵⁸ 江縈，《四譯館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史部第 272 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一，〈回回館〉、〈撒馬兒罕〉各條，頁 677-679。

⁵⁹ 向達，〈記巴黎藏本王宗載《四夷館考》〉，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654。

⁶⁰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17 冊），〈九邊四夷備錄·西域〉，頁 3891-3896；梁份，《秦邊紀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卷六，〈西域土地人物略〉，頁 413-417。

⁶¹ 尤侗，《西堂詩集·外國竹枝詞》（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65 冊，據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影印），頁 557。按尤侗自編《誨庵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 74 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下繫其事於康熙二十一年（頁 64），或係編訂之年，《竹枝詞》卷首自序屬康熙辛酉，今從之。

按鬱金香、佛頭（「俱佛頭花」）云云，皆是世傳罽賓國所出產，不過來源並非史傳，而是唐人筆記，且又經明人輾轉引用，致與原本已有出入。⁶² 照世杯則號稱「其明光徹，照之可知世事」，⁶³ 亦屬小說家言，大抵皆是中土士人對異域的想像。尤侗負責纂修的正是《明史·外蕃傳》，其中對巴達克山有簡短的描述，附列於哈烈之後：「八答黑商，其國奉佛，浮屠壯麗如王宮，永樂中，遣四十人來貢。」⁶⁴ 此句則是來自明中葉以降形成的四夷文本對巴達克山的標準敘述，與前引《吾學編》之文相核即可知，而在撒馬兒罕一段中，也可以找到「俱佛頭花」、「照世杯」等等記載。尤侗文中所展現出的想像與事實的混雜與張力事實上正是清初士人知識世界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明朝四夷文本的傳統被完全繼承，成為清初士人觀察中亞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來自筆記、稗史、小說的異域想像亦成為士人重要的參考資源，甚至經由修史的知識再生產而被賦予歷史文本的權威。直到乾隆中葉，士人方逐漸拋棄了舊有的知識譜系，與官方地理學合流。一七五〇年代西師告竣、疆土展拓對士人群體造成了極大的刺激，如全祖望所言「蓋自西師告捷，使節嚶嚶，古所未至，盡於極邊，而後探討，罔不了然」，⁶⁵ 西征中形成的奏牘公文、親至西域者留下的見聞記成為乾嘉學者考究、書寫「新疆」的新參考，而《四譯館考》一類文本遂被譏為「多不確實」、「不足以資掌故」。⁶⁶

⁶² 茅瑞徵，《皇明象胥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第10冊，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七，〈撒馬兒罕〉：「又《北戶錄》稱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為中國所無。」（頁654）覆按段公路，《北戶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卷三，〈指甲花〉：「唐初罽賓國獻俱物頭花，丹白相間，香氣遠聞」（頁60；事亦見《唐會要》，《太平御覽》卷九七〇、《玉海》卷一五三引同；《叢書集成初編》本《北戶錄》作「唐初罽賓國獻供物，頭花丹白相間」，誤）。所謂「俱物頭花」即紅蓮花，參見洪邁，《容齋四筆》（收入《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下冊），卷一三，〈四蓮華之名〉，頁786。陸楫纂，《古今說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5冊），卷一三，引錄訛為「佛頭花」，至清初修《佩文韻府》仍沿用不替。

⁶³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補遺卷四，〈外國·奉使杖節〉，下冊，頁936。

⁶⁴ 萬斯同等纂，《明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31冊，據清鈔本影印），卷四一五，〈外蕃傳·哈烈〉，頁644。

⁶⁵ 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朱鑄禹，《全祖望集匯校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上冊），卷二，〈皇輿圖賦（有序）〉，頁61。

⁶⁶ 永瑤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據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影印），卷八三，〈史部·政書類存目一·四譯館考〉，上冊，頁720。

概言之，自康熙中葉至乾隆初年，得益於持續西進的軍事行動以及來自俄國、準噶爾汗國的地理知識，清朝官方地理學中關於中亞的知識譜系不斷充實完善。官方地理學與一般士大夫的地理知識是完全斷裂的，對後者而言，西域、中亞是一幅由明朝四夷文本、筆記小說共同構成的、事實與想像混雜的朦朧圖景。不過由於地緣政治的作用，官方地理學的知識譜系大抵集中於天山北路、哈薩克草原一帶，而帕米爾西南的瓦罕—巴達克山地區，以及今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北部，對清朝而言認知仍較淺薄，甚至有完全空白的地域，而這正是清朝在進入中亞、面對穆斯林地方社會前夕，中樞決策層可以參考的知識資源。

三・清朝權力網絡在西帕米爾的初建

清朝在滅亡準噶爾汗國前後，逐步開始與中亞各國（部族）建立外交聯繫。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北路軍統帥定北將軍班第向哈薩克派遣使臣，隨之阿布賚汗遣使通好。三年後，清朝與之確立了穩定的定期貿易機制。⁶⁷ 是時清朝西陲經略的重心仍在天山北路，而直至大小和卓叛亂末期，隨著清朝逐漸掌控天山南路諸城，河中及外帕米爾的廣大伊斯蘭世界方與清朝產生直接的接觸。該區域內小國林立、互爭雄長，政治關係極為複雜，又是清朝此先地理認知的盲區，因而當清朝認識到大小和卓有可能流亡至此時，隨即將其權力網絡伸向此處，促使巴達克山、博洛爾、浩罕等部族政權先後「歸順」，也使大小和卓問題得到令清方基本滿意的解決。本節即圍繞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後清朝與巴達克山關於大小和卓遣還問題的交涉，討論清朝利用使者、商人、穆斯林地方精英逐步建立其中亞權力網絡與情報管道的微觀過程，檢視西師結束初期清朝中亞外交政策的變化。

（一）追討大小和卓

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時在避暑山莊的清高宗正為天山南路戰事的延滯而煩悶不已，靖逆將軍雅爾哈善率九千清軍圍攻庫車三月，不僅遲遲未能攻

⁶⁷ 乾隆二十年七月十六日班第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第1冊，頁6-11。有關清—哈貿易的研究參看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5-48.

克，其間霍集占馳援，亦未能擒獲，高宗一面向軍機大臣抱怨「區區庫車尚不能猝下，由此而阿克蘇、葉爾羌、喀什噶爾愈難攻克，安望成功」，⁶⁸ 一面又恨用人失當，「用匪其人愧若何」，⁶⁹ 遂於月初調定邊將軍兆惠取代雅爾哈善，統領大軍「趕今歲一徑進剿，冬間亦不復撤兵」。⁷⁰ 至本月下旬，戰事乃出現轉機，庫車、阿克蘇相繼歸誠，兆惠揮師西進，霍集占與布拉尼敦固守葉爾羌、喀什噶爾。此時高宗已預料到如葉爾羌不守，大小和卓有可能向西南逃入拉達克、痕都斯坦，故訓諭兆惠「速往追襲，毋失事機」。⁷¹ 為預先堵截計，高宗自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四年七月，陸續通過章嘉呼圖克圖及駐藏大臣頒諭拉達克汗，責成其協助緝拿大小和卓。⁷²

清朝亦注意到大小和卓逃向巴達克山的可能性。八月二十九日，素與霍集占相猜疑的烏什伯克霍集斯自烏什歸降，並向兆惠分析了霍集占逃亡的可能，「既與布魯特、安集延有隙，必不往投」，「伊必由葉爾羌逃亡痕都斯坦、哈喇土伯特、拔達克山」。⁷³ 兆惠對霍集斯的這一判斷深表贊同，十月行抵葉爾羌後，即派遣官兵堵截防守葉爾羌南向道路。但不同於拉達克，清朝與巴達克山並無直接聯繫，難以預為防範。至二十四年（1759）五、六月之交，隨著回疆情勢的進一步明瞭，清朝逐漸將堵截和卓後路的重心由拉達克轉向浩罕、巴達克山。五月，兆惠自喀什噶爾故伯克和什克伯克處聞知「霍集占兄弟與霍罕城之額爾德尼伯克交好，將來或往相投」，⁷⁴ 遂移文於額爾德尼伯克，曉以利害。同時，兆惠、富德分別呈覽喀什噶爾、葉爾羌地圖，高宗仔細斟酌後傳諭二人，英額奇盤山、伯

⁶⁸ 慶桂等纂，《清高宗實錄》（收入《清實錄》第 9-27 冊），卷五六七，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寅，頁 188。

⁶⁹ 清高宗，《御製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21 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卷八一，〈得庫車城誌事〉，頁 535。

⁷⁰ 慶桂等，《清高宗實錄》卷五六八，乾隆二十三年八月戊午，頁 204。關於大小和卓叛亂之始末，參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 65-72。

⁷¹ 傅恆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據武英殿刻本影印），正編卷六二，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丙午，頁 296。

⁷² 陳柱，〈拉達克協助清朝擒拿大小和卓考述〉，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八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 593-620。

⁷³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六二，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戌，頁 300。哈喇土伯特即拉達克。

⁷⁴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三，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乙卯，頁 145。按此係奉上諭日期，考慮到奏摺呈遞大抵需一月左右，則其拜發最遲應在五月中旬。

克呼爾璦嶺及玉魯克嶺可通巴達克山，裕勒阿里克可通巴勒提，薩納珠嶺可通拉達克，俱應駐兵堵截，並「於應行駐兵之地貼簽指出，寄伊等閱看辦理」。⁷⁵ 高宗設想的進剿計劃甚為縝密，兆惠攻喀什噶爾、富德攻葉爾羌，如霍集占走投喀什噶爾，則正入清軍包圍，如布拉尼敦棄城逃來葉爾羌，則外逃後路已斷。但清朝未曾料及的是，大和卓在清軍抵達之先業已逃遁。閏六月初三日，明瑞首先自喀什噶爾投誠回人處得知此信，並聞大小和卓曾通使浩罕、巴達克山，「拔達克山使人已回，又曾饋送拔達克山之克卜察克等部落禮物，或係逃往其地」。⁷⁶ 由於清軍分散各處，兆惠在接報後甚為謹慎，並未立即派兵追捕，而專意綏撫，並偵查大和卓下落。高宗於閏六月二十五日接獲兆惠奏摺，隨於次日傳諭軍機大臣，斷言「霍集占此時亦必逃遁，葉爾羌可不攻而下」，並責成兆惠、富德、額敏和卓、明瑞「作速領兵偵霍集占逃竄之路，窮追務獲」，「總以擒獲賊兄弟始可告成功」。⁷⁷ 如高宗所言，葉爾羌亦不戰而降，富德率清軍於閏六月十八日進駐城中。

自初三日聞大和卓逃遁之信後，兆惠、富德不斷通過地方穆斯林精英與降人打探大小和卓的行蹤。最早的消息來自喀什噶爾牌租阿巴特城伯克尼雅斯，初五日其遣人稟告，「霍集占兄弟約於色勒古勒之齊里袞巴蘇相會，若大兵速來，即可擒獲」；⁷⁸ 十一日，參贊大臣舒赫德路過自喀什噶爾逃出回人，據云布拉尼敦於六月初欲收攬人眾逃往巴達克山。二十一日，喀什噶爾回人阿述爾 (aşur)、艾特瑪特 (aitmat) 自霍集占處逃來，提供了更具參考價值的情報：小和卓先前通使巴達克山、安集延（浩罕），後者杳無音訊，而巴達克山應許「來人若少則可居留，若多則不可容」，布拉尼敦與霍集占在英噶薩爾會合，逃至噶札克 (gajak) 嶺，商議後決計前往塔該默 (tagaime) 地方，該處水草豐美、地土寬廣，可逃至巴達克山，若清軍未能追擊，則仍回葉爾羌、喀什噶爾居住。數日後，葉爾羌回人麻瑪里木 (mamarim) 亦稟呈了類似消息，大小和卓擬至塔該默地方停歇十餘日後，或往巴達克山，或往浩罕，而其屬下布魯特人則大多反對前往巴達克山。⁷⁹

⁷⁵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三，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庚申，頁147。

⁷⁶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四，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癸卯，頁170。

⁷⁷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五，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甲辰，頁174。

⁷⁸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五，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己酉，頁180。

⁷⁹ 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二十七日兆惠、額敏和卓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簡稱《錄副》）03-0177-1776-0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

是月下旬，追剿大小和卓的三路大軍相繼進發：明瑞在前堵截，阿里袞、巴祿自後追及，富德、阿桂則相機策應，相繼在霍斯庫魯克、阿爾楚爾大敗霍集占兄弟。七月初十日薄暮，清軍追至伊西洱庫爾淖爾 (isil kul noor)，又大敗之，盡獲大小和卓家口輜重，歸降者二千餘人。伊西洱庫爾淖爾地勢險要，「倚山臨水，單騎可容」，⁸⁰ 乃是準噶爾故土與巴達克山的交界處，自此向西即入巴達克山境內，霍集占見力不能支，遂越山逃遁。

值得關注的是清朝方面隨後的措置與高宗的反應。雖然兆惠在閏六月的奏摺中明確表示如大小和卓逃入巴達克山，「即直入其境，宣示軍威」，⁸¹ 但在伊西洱庫爾淖爾大捷後，清軍並未乘勝追擊，反而在巴達克山邊境停駐休養，與巴達克山展開交涉。如檢覽上諭，可知高宗事後對富德等人的遷延遲徊頗致不滿，謂「或以拔達克山為外藩，不便驚擾，但果秋毫無犯，伊等亦何辭以拒」，「乃勞瘁多時，而一時遲疑，渠魁即失，殊為可惜」，「富德從前若直前追剿，久經俘獲，乃坐失機會，朕深為追悔，不知富德等亦知愧悔否」。⁸² 事實上此一被視作失誤的決策正是由高宗本人做出的，上諭所云不過是諉過卸責而已。高宗對越境緝捕甚感躊躇，早在三月二十五日便密諭明瑞：

爾等此番進剿逆賊，必盡心竭力，以期擒獲布拉尼敦、霍集占諸人之身。

若未克執獲，官兵、回人俱難安寧，如何能竣大事？賊若逃遁，必追執之。間或得入別部，不可示軍威於無罪之部，惟遣使臣收取之耳。

suwe ere mudan cooha dosifi fudaraka hūlha be jafame genere de. urunakū
gūnin be akūmbume hūsun be wacihiyame. buranidu. hojijan sei beyebe jafame
bahara be kicekini. aika jafame baharakū oci. geren hafan cooha hoise irgese

學出版社，2012〕，以下簡稱《彙編》），第 40 冊，頁 48-49。波斯文史籍《巴達克山史》(*Tārikh-i Badakhshān*) 中亦記錄了類似的經過，稱大小和卓率領一萬二千人洗劫葉爾羌後西逃，其中九千人逃向浩罕，剩餘三千人隨和卓兄弟逃至巴達克山，參見 *Ta'Pux-u Badaхшан*, пер. с персидского А. Н. Болдырева при участии С. Е. Григорьева. Введ. А. Н. Болдырева и С. Е. Григорьева. Примеч. и прил. С. Е. Григорьева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7), с. 46. 關於此書之作者，參見 Farid Ullah Bezhan, "The Enigmatic Authorship of 'Tārikh-i Badakhshān'," *East and West* 58.4 (2008): 110-112.

⁸⁰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30 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卷二〇，〈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頁 180。

⁸¹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四，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癸卯，頁 170。

⁸²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七，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壬寅，頁 214；慶桂等，《清高宗實錄》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頁 667。

bahafī jirgame banjirakū. amba baita adarama wajici ombini. hūlha aika ukcame
tucici. urunakū amcafi jafa. talude encu aiman de dosime jabduha sehe manggi.
weile akū aiman de coohai horon-i isibuci ojarahū. damu elcin takūrafi gaisu.⁸³

根據明瑞的奏報，直到七月十二日清軍會合準備向巴達克山進發時，明瑞乃傳密旨於富德、阿里袞，諸將會商後，認為若冒然進發，稍有不當，牽連甚大，遂定議暫駐兵於巴達克山邊境，休養兵馬，而派遣使臣與巴達克山方面交涉。晚近學者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紀的中央歐亞事實上在經歷一個「邊疆」逐漸固定、封閉的過程，各政治實體通過各種方式明確與他者的地理界線、控制人口的跨界流動。⁸⁴ 從高宗的密諭與明瑞等人的措置來看，盛清中葉的君臣顯然有相當明確的「邊界」概念，且高宗亦無意將戰事延伸入帕米爾以西的中亞地區。清朝君臣構築了一套縝密的論說邏輯以證明回部戰爭的正當性：大小和卓兄弟悖逆聖恩、罪孽深重，發兵征討的範圍僅限於和卓家族舊境，而對於與和卓無涉的無罪之部（weile akū aiman），清朝不惟不加侵擾，更將施予恩賞。此一邏輯反覆使用於其後與中亞各政權的交涉談判，甚至影響到「後準噶爾時代」清朝的中亞外交政策。

在伊西洱庫爾停兩日後，清軍隨即展開新的交涉策略，大體可分為兩部分：一方面直接向巴達克山派出使者、遞交書札，另一方面則漸次與巴達克山周邊的地方頭目直接接觸，獲取有關巴達克山的最新情報。

七月十四日、十八日，清軍先後派出兩個使團，攜帶清方將領致蘇勒坦沙的波斯文信札，分兩路前往巴達克山。前者以塔本吉賽之故厄魯特德木齊巴蘇泰（basutai）為正使，通曉波斯語的布魯特阿奇木之弟額色木與色勒庫爾回人艾迪默特（adimet）為副使；後者以厄魯特藍翎薩穆坦（samtan）為正使，降人蘇勒坦和卓、霍集斯屬下之藍翎額勒木布爾（erembur）、厄魯特人敦多布為副使。⁸⁵ 雖然其中多數人的出身與經歷均無從查考，僅從銜名來看，應主要是來自準噶爾汗國與天山南路穆斯林社會的新近歸降者。有趣的是，使團中並沒有八旗滿洲、蒙古或外藩蒙古成員，兩名正使均曾為準噶爾汗國舊人，考慮到噶爾丹策零曾出兵巴

⁸³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富德、巴祿、明瑞、阿桂摺，《錄副》03-0178-1782-015，《彙編》第40冊，頁259-260。

⁸⁴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pp. 265-267.

⁸⁵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內寫作「dondok」（《錄副》03-0178-1782-005，《彙編》第40冊，頁266），疑誤。按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富德等奏為議敘賞給使者花翎藍翎摺內作「dondob」（《錄副》03-0178-1785-023，《彙編》第41冊，頁70），《方略》內亦音寫作「敦多布」。

達克山，清朝此舉或是欲繼承準噶爾汗國在中亞的威權與影響。使團中的穆斯林成員因共同語言與宗教之便，成為與巴達克山的實際交涉者，艾迪默特未詳是何出身，此外三人皆與清朝的回部統治有密切的關聯。蘇勒坦和卓係安集延人，此前不久方向阿里袞投誠，其人「數往巴達克山，與伊汗相識」，⁸⁶ 後在乾隆中葉與中亞交涉中反覆出現，是清朝與中亞世界的重要中間人；額色木之兄布魯特阿奇木係較早歸降清朝的布魯特首領，此時正在阿里袞軍中充任嚮導；額勒木布爾的領主霍集斯於乾隆二十年（1755）擒獻達瓦齊，烏什歸降後，受封貝勒品級貝子，任和闐六城伯克。正是借助於回部與中亞既存的穆斯林世俗社會網絡以及準噶爾汗國曾經的霸權，作為外來者與異教徒的滿洲統治者方能在短時間內協調於當地原有的社會框架，並逐步鋪展其自身的權力網絡。

巴蘇泰使團因途中生變，未能如約抵達，巴蘇泰其人後亦被清朝處死。⁸⁷ 薩穆坦使團則在不久後陸續傳來情報。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中存有一份簡短的呈文：

蘇勒坦伯克、薩穆坦皆聞知和卓惡行，令我等生憂。和卓等既入巴達克山之地，伊等並無首領，為各處歸降和卓之回人所怨恨，伊劫掠回人馱馬，貽害甚大；我等既知和卓惡行，合兵直入巴達克山腹地，與伊交戰，雙方戰歿甚多，和卓之子女、沙比及隨人悉數折損。

sulten bek. samtan-i sasa hojom sei ehe yabuha baita. mende jobolon isibuha babe donjiha manggi. be saha. hojom se badakšan-i nukte de dosika manggi. tese uju da akū oho. hojom dalafi ba bai hoise sede koro isibuha. hoise sei temen morin be tabcilame gaifi. ambarame jobobuha. hojom sei ehe yabuha baita be saha manggi. be hono cooha isabufi badakšan-i dulimbade dosika manggi. afandufi juwe ergi kejine niyalma bucehe. hojom sei hehe juse. šabisa. dahalara urse be yooni gasihiyabuha.⁸⁸

此件原歸入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包，據其中敘述，或有誤，筆者推測此文應呈送於二十四年八月，是薩穆坦抵達巴達克山後最先收集到的情報，亦是蘇勒坦沙首度

⁸⁶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富德、巴祿、明瑞、阿里袞摺，《錄副》03-0178-1782-005，《彙編》第40冊，頁266。原文為「badakšan de ureme yabuha ceni han be takara」。

⁸⁷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5-023，《彙編》第41冊，頁70。

⁸⁸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蘇勒坦沙咨呈，《錄副》03-0177-1746-043，《彙編》第36冊，頁357。

就大小和卓問題而向清朝示好。⁸⁹ 八月二十三日，薩穆坦返回阿勒楚爾軍營，帶回了進一步的信息，聲言大小和卓已被巴達克山統治者蘇勒坦沙擒獲，霍集占重傷而死，但蘇勒坦沙因「摩羅及阿琿等據經文，無將同類獻與他國之理」而拒絕遣送布拉尼敦。⁹⁰

在派出使者與蘇勒坦沙交涉的同時，清朝開始嘗試與巴達克山周邊部落、村寨進行直接接觸，一方面從側面探聽巴達克山與大小和卓的情報，另一方面則是消除和卓殘部與地方勢力聯合反擊的可能，並向巴達克山施壓。七月十四日，清軍向西越過伊西洱庫爾淖爾，到達貢特河谷中的袞都，清方文獻中形容此地為 *gašan*（村寨），事實上是一個僅有百人、附屬於巴達克山的小型聚落。阿里袞隨即傳召袞都伯克沙莽蘇爾（*šamangsūr*），詢問大小和卓逃遁時情狀，並曉諭之云：

霍集占等種種悖謬惡行，大軍收服葉爾奇木（*yerkim*）、喀什噶爾，追剿賊黨，斬獲甚多，悉奪其游牧（*amba nukte*）並人口萬餘。今（伊等）勢窮遁入爾地，我將軍、大臣業經遣使爾汗索取。無論何人執之，必大加恩賞。若不執獻，必不退兵，徑入爾地搜捕，爾不能敵。

hojjan sei hacin hacin-i ehe fudasi weile. meni amba coohai yerkim hasigar-i gubci be gaiha. hūlha be fargame amcafi ambaramē gidaha. tumen funcere anggala amba nukte be yooni afafi gaiha. te encehen mohofi suweni bade dosika be meni jiyanggiyūn ambasai baci emgeri elcin tucibufi suweni han ci gaime unggihe. yaya we jafame alibuci urunakū uju kesi šang isibumbi. jafame aliburakū oci. meni cooha bedererakū urunakū suweni bade dosifi jafambi. suwe alime muterakū.⁹¹

沙莽蘇爾叩首應許，並陳言袞都之人懼被劫掠而入山避匿，請暫駐兵稍遠之地以候使者歸來，阿里袞亦應許，退至巴什楚勒（*bašicūr*）地方與富德會合。對袞都

⁸⁹ 此呈文可能是薩穆坦等離開巴達克山前夕所寄出。根據時人估算，由軍營遣使至巴達克山需十二日左右可至（佚名奏片，《錄副》03-0177-1711-022，《彙編》第32冊，頁354），文書傳遞的最快速度當大體如是，但清方將領直至八月二十一日尚未得到任何反饋消息，而二十三日薩穆坦已抵軍營，所稟之情報又較此咨呈為詳，據云是啟程後二日方獲知，則此咨呈必在其啟程前業已發出，在薩穆坦抵達前後送至。

⁹⁰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九，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辛未，頁241。按，霍集占已死的消息並不確實，下文另有辨。

⁹¹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2-005，《彙編》第40冊，頁265。

的籠絡很快收到成效，至八月初七日，沙莽蘇爾親至軍營，並帶來了臨近的阿里木伯克 (alimbek) 之使者與什克南沙穆爾伯克 (šamur bek) 之呈文，皆表示甘願歸順清朝。爲示好於清朝，沙莽蘇爾令其弟沙哈勒噶斯 (šahargas) 擒獻數名沙喇斯、瑪呼斯部叛黨，什克南之沙穆爾伯克亦聲言在接獲清方印文後即協同蘇勒坦沙截擊大小和卓。⁹² 至八月二十三日，年逾九十的瓦罕伯克米爾莽蘇爾 (mirmangsur) 遣子蘇勒坦至軍前進表歸降，呈送禮物、馬匹，富德等嘉許「爾等仰慕大汗之仁化而歸順，不易衣冠，惟嚴加約束下人，照常安居」，承諾如「大軍直入巴達克山搜捕霍集占等」，「雖路經瓦罕，必不滋擾爾游牧」，並言「如有售賣之糧米，聽任攜來軍營貿易」。⁹³ 瓦罕有千餘戶，在巴達克山東北、噴赤河上游，是葉爾羌、色勒庫爾一帶與中亞交通的必經之路；沿噴赤河而下，在瓦罕西北方向則是什克南、袞都以及阿里木伯克所轄地。⁹⁴ 至此，清朝已經取得巴達克山北部、東部的地方領袖的支持與合作，在與蘇勒坦沙的後續交涉中，這些歸順的地方領袖事實上成爲清朝重要的情報來源，亦對巴達克山形成有效的鉗制。

(二) 教義與利益：蘇勒坦沙的策略

至二十四年八月末，雖然清朝已與巴達克山汗蘇勒坦沙通過使者建立了直接聯繫，並爭取到周邊地方領袖的支持，但在追捕大小和卓上仍不得要領，袞都、什克南、瓦罕以及清方使者皆報告稱和卓兄弟爲蘇勒坦沙所敗，然而其下落卻不得而知，各方情報亦互有出入。對於蘇勒坦沙是否可以擒獻和卓兄弟，清朝君臣皆無確切把握。在八月二十一日會銜所上奏摺中，富德、阿里袞對此無所適從的局面敘述甚明：

⁹²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5-009，《彙編》第41冊，頁34；傅恆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八，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巳，頁227。

⁹³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5-028，《彙編》第41冊，頁77-78。乾隆二十五年米爾莽蘇爾上表內稱年已九十六，參看乾隆二十五年五月軍機處奏片，《錄副》03-0178-1823-008，《彙編》第45冊，頁420。

⁹⁴ 什克南 (shighnān) 是由塔吉克人統治的巴達克山附庸，關於此地區的地理概況，參看 Ludwig W. Adamec ed.,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Gazetteer of Afghanistan*, vol. 1, *Badakhshan Province and Northeast Afghanista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 1972), pp. 160-162。關於瓦罕 (wākhān) 的地理狀況以及一八八〇年代後的政治狀況，參看同書，頁183-185。

伊等（引註：瓦罕等地伯克）所言俱係聽聞，未嘗親見，前後不符。……特遣往蘇勒坦沙處之薩穆坦、蘇勒坦和卓逾期未回，蘇勒坦沙處亦全無消息。伏思巴達克山近邊之諸伯克頭目雖屢次遣人來見，言願為主上臣僕，又擒送沙喇斯、瑪呼斯之黨數名，舉動恭順。惟賊霍集占逃入巴達克山，奴才深知伊但求遁荒僻無人之地而已。蘇勒坦沙誠若身自率兵迎擊，不特不易逃遁，且可即於陣中執獲。此間我等使臣理宜返回，若不然，蘇勒坦沙處亦應有一確信，不致遲滯如此。

esei alaha gisun gemu urahilame donjiha. umai yasa sabuhakū. juleri amala fuhali acanarakū bime. . . . cohome sultanša de takūraha samtan. sultan hojo se boljohon tulitele amasi isinjahakū bime. sultanša-i baci inu umai emu mejige buhekū. ahasi kimcime gūnici. badakšan-i jecen-i ergi bek data. udu gemu cihanggai ejen-i albatu oki seme. ton akū ahasi de niyalma takūrafī acanjime. geli jafaka udu šaras. mahūs-i urse be benjibuhe. ginggun ijishūn-i arbušacibe. damu hūlha hojijan ukafī. badakšan de dosika hūsun encehen. ahasi-i tengkime sarangge. koco wai niyalma akū babe baime ukame duleci dulere dabala. unenggi sultanša beye cooha gaifī okdome afahangge yargiyan oci. ja de ukcame muterakū sere anggala. uthai afara de jafafi tucikini. ere sidende musei elcin be amasi unggici acambi. akūci. sultanša-i baci inu ahasi de karu emu yargiyan mejige buci acambihe.⁹⁵

富德、阿里袞等在具奏之同日向蘇勒坦沙派出第三個使團，由二等侍衛額爾登額、和闐伯克霍集斯及霍集斯之兄阿卜都瓜卜（abduguwa）率兵一百前往，並向蘇勒坦沙作出最後通牒：「若願承主上恩澤，則擒賊黨霍集占等送我使臣；若願干犯暴戾，容留霍集占等，以待一戰，即送還我使臣，令之傳語。我之軍威及霍集占等罪愆，爾等無不知者。將此傳語曉諭爾蘇勒坦沙，熟度利弊而行。」⁹⁶ 事

⁹⁵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5-009，《彙編》第41冊，頁34-35。

⁹⁶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5-009，《彙編》第41冊，頁37。原文為「amba ejen-i kesi fulehun be aliki seci. hūdun hojijan sebe jafafi. meni elcin de afabufi benju. suwe aika cihanggai weile be necime hojijan sebe halabume bibufi. dain oki seci inu uthai hūdun meni elcin be amasi unggifi karu gisun bu. meni coohai horon. hojijan sei araha weile be suwe sarkū sere ba akū. ubabe ulan ulan-i suweni sultanša de ulhibume alafi. aisi jobolon be urebume bodofi yabu」。

實上此時富德等人仍希望借助穆斯林社會已有的關係網絡解決和卓遣返的問題，選擇霍集斯兄弟的原因即是其「諳回人稟性」，且阿卜都瓜卜又與霍集占有殺妻兒之仇，「汲汲於擒賊」。⁹⁷ 不過高宗的態度已有所轉變，傳諭飭責富德、明瑞等人未親身前往，「拔達克山豈因一霍集斯之言，遂縛賊以獻，即令獻出賊人，而其功似出於霍集斯，將軍大臣等復置身何地乎？」⁹⁸ 甚至一改此前的謹慎，擬於次年用兵巴達克山、宣示軍威，「選兵數千名，直入其境搜捕二賊，即將拔達克山部落一併辦理，亦無不可」。⁹⁹ 在攻取喀什噶爾、葉爾羌以前，高宗已對霍集斯有所防範，諭示兆惠不可輕信其人，此時產生懷疑理固宜然。另方面，高宗深恐過度依靠於穆斯林社會網絡與地方精英將使清朝的中亞交涉陷於被動，尤須防止地方領袖藉清朝以自重。二十四年八月至二十五年初，清朝與巴達克山就送還大小和卓屍骸直接展開了曲折的交涉，而在此過程中，巴達克山汗蘇勒坦沙則藉教義反覆與清朝談判，試圖以此擴張其在中亞的威勢，清朝方面則需廣泛搜集相關情報以及時判斷與回應，這事實上形塑了盛清中葉清朝處理與巴達克山關係的基本框架。

蘇勒坦沙聞知大小和卓敗逃入境後，最初態度是積極的，先行遣人至阿爾袞察赫 (Аргунчах) 地方迎接，隨後在都城法扎巴德 (paisubad) 附近會見和卓兄弟，並允許和卓所部駐紮於科克洽河畔的扎吉拉齊。然而和卓兄弟卻仍然希冀於整頓兵力、東山再起，入境之初便縱容所部搶掠馬畜，隨後又謀劃藉助殘部兵力篡奪巴達克山政權。¹⁰⁰ 蘇勒坦沙在重重威脅之下，於七月二十八日在法扎巴德將和卓兄弟拘捕，隨即押至柴扎卜 (caijab) 監禁。¹⁰¹ 和卓兄弟又在拘禁中向蘇勒坦沙致函云：「我因與汝同教、共為聖裔，故來求汝，汝心生惡意，將我劫掠圈禁。今大軍追來，遣使索我，可生獻我等於大皇帝，不然則屬眾財物俱與汝，留我跟役一人，我等願往尋先知之默克 (meke)，今拘禁於此，是何事也！」¹⁰²

⁹⁷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5-009，《彙編》第41冊，頁37。

⁹⁸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八，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己巳條，頁239。

⁹⁹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九，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辛未條，頁242。

¹⁰⁰ *Ta'rix-i Bada'ishan*, c. 46-47. 阿爾袞察赫尚無法比定其位置，參見同書，頁105。

¹⁰¹ 其間細節參見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第二章，〈喀什噶爾和卓家族的分裂〉，頁78-79。

¹⁰²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額爾登額呈文，《錄副》03-0178-1790-003，《彙編》第41冊，頁426。原文為「be simbe emu nomun-i pahapar-i enen seme baime jihe. si ehe gūnin

此時蘇勒坦沙受到多方面的壓力，不僅清朝大兵壓境、咄咄相逼，伊斯蘭世界亦指責其違背教義拘執和卓，如何處置和卓兄弟甚為棘手。蘇勒坦沙向清朝陳言，「琿都斯 (hündus) 以救二和卓為由發兵，二和卓又生惡念，潛通使臣，謀與我敵國達爾瓦斯 (tarbas) 合兵以殺我」，¹⁰³ 同時布哈拉 (buhair)、巴爾赫 (balhei) 等國俱由此與巴達克山有隙，因相去不遠，蘇勒坦沙已做好準備「萬一前來，即與相戰」，¹⁰⁴ 甚至巴達克山內部也有所不靖，蘇勒坦沙不得不強力鎮壓。¹⁰⁵ 面對此一亂局，蘇勒坦沙的策略則是依違於教義與利益之間。就教義言之，向清朝引渡二人無疑會在穆斯林世界引發更大的波瀾，故蘇勒坦沙遣使鄂穆爾拜 (ūmurbai) 呈稱本欲呈獻和卓，但因「阿琿、摩羅俱各哭泣」、「先知子孫無執送他人之例」而中輟。¹⁰⁶ 就利益言之，蘇勒坦沙並不欲結怨於清，反而希望藉清之力與諸鄰抗衡，而折中之策莫過於先行殺死大小和卓，復以此為籌碼向清朝居功，以換取庇護。

deribufi. membe okdome afame afafi gemu tabcilaha. ne amba cooha fargame jifi. sinde elcin takūrafī membe gaimbi. si membe amba ejen de weihun alibume bu. akūci meni ne bisirele niyalma jaka be. si gemu gaisu. mende damu emte dahara niyalma bufi. be paihapar-i bisire meke be baime geneki ubade tuwakiyarangge ai baita」。按默克即麥加，參見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頁 13。

¹⁰³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額爾登額呈文，《錄副》03-0178-1790-003，《彙編》第 41 冊，頁 419。原文為「hündus ci juwe hojom be gaju seme cooha jihede juwe hojom geli che oshon gūnin deribufi hündus cooha. mini kimungge tarbas gurun be guilefi mimbe waki seme hūlame niyalma takūraha」。達爾瓦斯在清代漢文文獻中或寫作「塔爾巴斯」。

¹⁰⁴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富德、阿里袞、明瑞、阿桂摺，《錄副》03-0178-1789-019，《彙編》第 41 冊，頁 407。蘇勒坦沙所列舉的地名中尚有一 rokob，此詞並非來自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其確指何處仍俟考。

¹⁰⁵ “Central Asia Material III: Revelations Regarding Badakhsh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9 (1895): 196.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在新 9、10 期連載有一份簡明巴達克山及周邊地區編年史，未標撰者，應是據中亞波斯文史料整理而來，年代多有錯訛，但所記事件大體可信。

¹⁰⁶ 關於鄂穆爾拜使團的活動，現存檔案與《方略》記載互有詳略，參看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富德札付蘇勒坦沙稿，《錄副》03-0177-1718-032，《彙編》第 41 冊，頁 359；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九，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頁 250。「先知子孫」滿文作「paihabar-i juse omosi」，其「paihabar」一詞漢文多音寫為「派罕帕爾」或「派噶木巴爾」，實為波斯語「paighām-bar」（先知）的音譯，參看 Francis Joseph Steingass, *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Including the Arabic Words and Phrases to Be Met with in Persia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 268.

關於大小和卓被殺始末，佐口透先生已據《方略》中的錄供進行了梳理。¹⁰⁷筆者尚有兩點補充。其一是蘇勒坦沙決定殺死和卓兄弟後向部眾的一段訓諭：

伊雖係我教先知後裔，然擾害生靈、獲罪主上 (amba han)，既為我所俘，仍不泯惡念，潛通敵國為伊發兵，終使我不得太平。我等今歸附主上，甘為臣僕 (albatu)，大軍現在我境，我殺伊等，乃得仰主上之威而安居。

ere udu musei emu nomun-i paihabar-i enen bicibe. amba han de weile bahafi utala ergengge jocabuha bime. musede jafabufi kemuni ehe oshon be halarakū musei kimungge gurun. geli esei jalin cooha jifi lehembī. atanggi bicibe ainaha seme muse be taifin banjiburakū. musei te amba han de emgeri albatu ome dahaha bime. amba cooha ne musei jecen de isinijhabi. muse esebe wafi. amba han-i horon de nikefi jirgame banjiki.¹⁰⁸

此係使者額爾登額根據蘇勒坦沙的口述而寫入呈文，《實錄》、《方略》未收，同時期有關巴達克山內部政治情況的史料極其罕見，故此段彌足珍貴。蘇勒坦沙在向巴達克山屬眾解釋何以要殺死大小和卓時並未直接回應宗教階層的質疑，而是完全自政治利益的角度出發，一方面聲明和卓潛通敵國、倡亂滋事，為太平之計，必須誅殺；另一方面則強調歸附清朝將給巴達克山帶來巨大的政治收益，且足以消弭結怨伊斯蘭世界的顧慮。值得注意的是蘇勒坦沙將其與清朝的關係形容為「主僕」(han/ejen-albatu)，在此之前，鄂穆爾拜已向富德等人表示蘇勒坦沙願為「主上之臣僕」。這是清朝中亞外交語境中一種十分常見的表述，清與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均曾建立這種與傳統儒家觀念下的宗藩關係迥異的主僕關係。¹⁰⁹在此需要檢視的是 albatu 一詞的特殊性。ejen (qayan) 與 albatu 是蒙古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紐帶之一，凡向其領主承擔貢賦者——無論是平民 (arat) 之於諾顏 (noyan) 抑或諾顏之於可汗——皆稱為 albatu (阿勒巴圖)，所不同者，後種情形下雙方並不具有從屬性。¹¹⁰ han/ejen (qayan/ejen) 進入滿洲社會甚早，故已本土化成為滿洲人日常行用的基本概念，但 albatu 則不同，直至乾隆晚期，作為「屬

¹⁰⁷ 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頁79-80。

¹⁰⁸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額爾登額呈文，《錄副》03-0178-1790-003，《彙編》第41冊，頁419。

¹⁰⁹ 小沼孝博，〈清朝とカザフ游牧勢力との政治的關係に関する一考察〉，頁45-53。

¹¹⁰ (俄)弗拉基米爾佐夫撰，劉榮峻譯，《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249-250。

民」之意的 *albatu* 仍然被視作滿文 *jušen* 的對應而已。¹¹¹ 即使在處理內外札薩克蒙古事務時，*albatu* 一詞仍然是偏重社會階層與法律意義的身份屬性，與 *arat* 相似，檢諸後金及清初期與蒙古往來的滿蒙文文書，從未將雙方形容為 *han/ejen* (*qayan/ejen*) 與 *albatu* 的關係。那麼盛清中葉與中亞諸部族建立的這種關係，其直接來源很有可能即是準噶爾汗國，而非此前統治東部蒙古的經驗。

其二是大小和卓被殺的時間以及清朝獲知該消息的渠道。和卓兄弟的死期，漢文史料中未見明確記載，佐口透推定為七月二十八日二人被拘禁後不久，依據是清使薩穆坦覆命時呈報，據云「起程二日，拔達克山人追來告稱霍集占傷重身死」。¹¹² 薩穆坦八月二十三日回營，溯推則其獲知霍集占死訊當在八月十五日前後。筆者尚未找到薩穆坦使團的初始呈文或奏稿，不知具體情況如何，但大小和卓同日被蘇勒坦沙派人所殺，薩穆坦所得到的消息顯然有所出入。據和卓隨從門多索丕 (*mundosopi*) 所供，大小和卓七月二十八日在法扎巴德被拘捕後，隨即被押送至柴扎卜分別監禁，十餘日後有人來請二人移居別處，詭云「蘇勒坦沙命將汝等遷居華屋，給予口糧，在彼處過冬」，遂將二人帶至暗室圈禁，至第三日，有二百餘人包圍房屋，「二和卓知覺，沐浴誦經」，¹¹³ 遂被殺。這與薩穆坦獲知霍集占死訊的日期大抵相合，二和卓的死期應不會晚於八月十五日。由於薩穆坦帶回的消息極為模糊，而由額爾登額為首的使團直至九月初九日至巴達克山，二十日方向富德等人報告大小和卓的確切死訊以及勘驗霍集占屍骸的詳情，在此期間，清朝主要經由巴達克山周邊諸部族獲取消息。至九月初，蘇勒坦沙殺死大小和卓的消息逐漸在帕米爾以西傳播開來，臨巴達克山較近的袞都、什克南諸部均有所聞，袞都伯克沙莽蘇爾遣人稟告稱：「我遵將軍、大臣之命，採取霍集占之消息，巴達克山方向之達爾瓦斯 (*darbas*) 等四部遣使蘇勒坦沙索取二和卓，蘇勒坦沙不與，遂於沙雅爾 (*šayar*) 地方刀殺霍集占兄弟。」同時，什克南

¹¹¹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85-86。《御製滿蒙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721 冊，據武英殿刻本影印），卷一二，〈人部·鈍繆類〉下收有「*albatu*」一詞，釋義為「粗野遲鈍之人謂之 *albatu*；不知禮之貌」(*muwa modo niyalma be albatu sembi. doro sarkū arbun*)，對應蒙文為 *küdegi*（頁 106），《御製增訂清文鑑》漢文釋義為「村粗」，與本文討論者無關。

¹¹²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九，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頁 249。佐口透，《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頁 80，引作九月丁亥，誤。

¹¹³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額爾登額呈文，《錄副》03-0178-1790-003，《彙編》第 41 冊，頁 426。

的阿里木伯克亦呈文稱：「我遣人至巴達克山探問霍集占消息，二和卓業已獲釋云云俱係訛言，其在沙雅爾地方拿獲被殺是實。」¹¹⁴ 隨後瓦罕伯克米爾莽蘇爾報告了更進一步的消息，稱蘇勒坦沙已應許將和卓屍骸送還清朝。在九月二十二日的奏摺中，富德、阿里袞據此作出推測：

或我使者抵達之先，蘇勒坦沙為達爾瓦斯等四部所迫，若留活口，或釀事端，遂殺二和卓；或別有情由，難將二和卓交我使臣，故意揚言，亦未可知。雖未必是實，惟皇上等候消息，聖意焦勞，奴才等深為不安。今所得消息業已奏聞，其後額爾登額呈獻二賊首級，奴才等查驗若實，再行飛報奏捷。

embici musei elcin isinara onggolo. sultanša yargiyan-i darbas-i jergi duin aiman de hafirabufi weihun-i bibuci. baita dekdeburahū seme juwe hojo be waha. embici encu turgun bifi hojo sebe. muse de bure de manggašame. jortanggi algibume gisurere be gemu boljoci ojarahū. uthai yargiyan de obuci ojarahū bicibe. damu ere baitai jalin inenggi dōbori akū enduringgei gūnin ališame mejige aliyame bisire be ahasi yargiyan-i fathašahai teme dosoro te mejige bahara be tuwame neneme donjibume wesimbuhe. sirame eldengge se isinjifi juwe hūlhai uju aliburengge. yargiyan oci. ahasi eiten siden temgetu be yargiyalaha dade. umesi yargiyalaha manggi. encu serki feksibume hūdulame donjibume wesimbuhe.¹¹⁵

不久後，額爾登額攜霍集占屍骸、和卓生前隨從及巴達克山使者抵達軍營。十月初二日，清軍開始自帕米爾以西撤回葉爾羌。此時尚未接獲捷報的高宗特命軍機處預先撰擬了兩份文辭相反的敕書，以備頒與蘇勒坦沙，並寄諭兆惠云：「若巴達克山已來獻霍集占等賊，即將溫諭之敕頒示；若推託迄未致送霍集占等賊，即將嚴辭之敕頒示。」¹¹⁶ 二十一日，富德捷報至京，高宗即以平定回部宣

¹¹⁴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9-010，《彙編》第41冊，頁262。

¹¹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9-010，《彙編》第41冊，頁263。

¹¹⁶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傅恆寄信兆惠，《錄副》03-0178-1791-019，《彙編》第42冊，頁61。原文為「eici benjibumbi seme alaha oci. uthai amala araha nesuken gisun-i hesei bithe be unggikini. isitala badakšan aika hūlha hojijan sebe benjiburakū siltame anatarā oci. uthai neneme araha cira gisun sindaha hesei bithe be unggikini」。

諭中外，以示功成。同日，軍機處預擬的「溫諭之敕」由兆惠頒給蘇勒坦沙，內云：「朕為天下之主，內外無分，俱一體恩養，今汝感朕仁化，願為臣僕，朕加意垂憐。」¹¹⁷ 清朝與巴達克山就大小和卓而跌宕數月的交涉就此結束，而巴達克山亦正式與清朝確立了「主僕」(ejen-albatu) 的關係。

四・準噶爾遺產與清朝西進

一七五〇年代清朝向西展拓之先，在知識與制度上均無充足的準備。其官方地理學中對中亞的認知是極為模糊的，士人知識世界對渺遠西域的理解亦僅僅限於先代舊史與明朝盛行的四夷志書；京師諸衙署無法識讀、處理回語文書，甚至需在西域使團中臨時尋找通回語者，經蒙文轉譯為滿文。¹¹⁸ 清朝在短時間內展開與中亞諸國的外交，並在帕米爾以西構築其權力與情報網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對準噶爾遺產的繼承與利用。所謂準噶爾遺產，蓋指準噶爾汗國滅亡後所遺留的社會網絡與政治關係，如人員、語文、政治邏輯與術語等。Laura Newby 在討論清與浩罕的早期外交關係時即已發現，清朝與穆斯林社會交涉的意識形態基點在相當程度上是蒙古式的普世主義 (Mongol-style universalism)。¹¹⁹ David Brophy 最近關於新疆伯克制的研究亦表明，清朝在新疆的權力建立於準噶爾汗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基礎之上，滿洲人最初與新疆穆斯林精英的交流以蒙古語為中介展開；在清朝皇帝看來，新疆穆斯林與已經歸附的蒙古具有相似性，因而其不必、亦無需建立一個單獨的基於伊斯蘭文化的合法性論述。¹²⁰ 惟後者僅限於清朝對南疆統治的建立，前者雖涉中亞，但極簡略、未能展開。清與巴達克山的早期交涉為審視十八世紀中葉中亞政治與外交中的準噶爾因素提供了合適的例證，本節將在前文考述史實的基礎上稍加分疏。

¹¹⁷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敕諭巴達克山汗，《錄副》03-0178-1791-016，《彙編》第 42 冊，頁 301，原文為「bi abkai fejergi be uherilehe amba ejen. dorgi tulergi be ilgarakū gemu emu adali bilume gosimbi. te sultanša si mini gosin wen be buyeme albatu oki sere be. bi labdu gosime tuwaha」。軍機處撰擬的另一「嚴詞敕諭」見《錄副》03-0178-1791-017，《彙編》同冊，頁 302-306，此二件皆係滿文、波斯文合璧。

¹¹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編，《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康熙三十七年檔，第 15 冊，頁 491。

¹¹⁹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p. 42.

¹²⁰ David Brophy,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 (2013): 257-258.

準噶爾汗國在數年之內隕落以及清軍乘勢橫掃天山南北路給中亞世界帶來了極大的震撼與不安，哈薩克阿布賚汗的四世孫喬罕瓦里漢諾夫 (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 在十九世紀中葉仍然評述道「曾為鄰國之患的如此強勢的汗國一夕傾覆，在整個亞洲造成恐慌，也激起了穆斯林的憂慮，即清朝將征服天下，彼時將成為世界的終結」，¹²¹ 可見其在中亞共同歷史記憶中造成的影響之深。清朝不僅以準噶爾汗國領土繼承者，更以準噶爾汗國征服者的身份出現於中亞。因此，清高宗及中亞地區的統治者均嘗試利用準噶爾時期業已形成的社會結構以調適雙方關係。高宗先後派出以準噶爾降人巴蘇泰、薩穆坦為首的使團，清軍將領反覆宣揚其滅亡準噶爾之軍威，如謂「我大軍數年間滅準噶爾，哈薩克、布魯特、塔什干之回子俱已歸附，汝無不知者」云云，¹²² 皆與此有關。袞都伯克沙莽蘇爾面陳富德云：「我父自噶爾丹策零時管轄此地，今聞葉爾羌等城皆為大皇帝臣僕，霍集占敗竄，我等即遵令追其後隊，賊人逃入伯克沙穆爾游牧，我因此面求歸附。」¹²³ 蘇勒坦沙降清後，曾數次向清朝請兵，噶爾丹策零與巴達克山故伯克通好、發兵助兵之先例也成為其反覆申說的理由之一。¹²⁴ 事實上，在中亞穆斯林世界看來，準噶爾的中亞霸權固宜由滿洲人接續，原向準噶爾汗國稱臣的諸部族亦應歸附清朝，而清朝自應向前者提供如準噶爾汗國所曾提供的保護。

在政治術語與邏輯方面，準噶爾遺產皆成為清朝中亞外交得以展開的基礎，除前文所述的「ejen-albatu」關係外，另以富德等人對蘇勒坦沙的回應為例說明。蘇勒坦沙以違背教義，阿訇、毛拉不許等情由拒絕引渡和卓兄弟，於二十四年八月遣使鄂穆爾拜等向富德呈明。富德等旋即撰擬回函一封，命薩穆坦及卡倫侍衛五岱、成果隨鄂穆爾拜返回，傳信與蘇勒坦沙，其函略謂：

霍集占等尚劫汝牲畜財物，陣中傷汝之人，若我大軍追至而不剿，將置汝巴達克山於何地？汝因我之威力而游牧安寧，已得俘虜，而未將二和卓呈

¹²¹ Chokan Valikhanov, "Alty-shahr: Historical Review," in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 ed. Capt. Valikhanov and M. Veniukof, trans. John and Robert Michell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5), p. 188.

¹²²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富德致蘇勒坦沙札付，《錄副》03-0178-1782-005，《彙編》第40冊，頁270。原文為「meni cooha ere udu aniyai sidende. jun gar be mukiye buhe. hasak. burut. tasigan-i hoise be yooni dahabuha be suwe donjihakū sere ba akū」。

¹²³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七八，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巳，頁227。

¹²⁴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蘇勒坦沙咨文，《錄副》03-0178-1825-011，《彙編》第46冊，頁1。

送，仍可謂宣力於聖主耶？且葉爾奇木、喀什噶爾等四城及此番霍集占帶出者之勢，俱爾所深知者，四城土地民人及霍集占等所帶出二三萬人，我等俱能攻取之。帶無能女子凡數百逃遁之霍集占，我反不能擒，而為汝等所推延乎？特汝等素未干犯我大國，我國之道，無進兵擾累無罪部落之例，故我等方暫駐兵，不悖道義。曩者遣使討索霍集占，我大軍此數年間滅準噶爾，討服東哈薩克，收降西哈薩克、塔什干、布魯特，汝等無不知者，我若入汝境執拿，焉有所懼？我等不忍毀汝稼穡、害汝人畜，故未進兵。汝反不執獻，可乎？若謂白帽派 (šanyan mahala) 經典中無執和卓以獻他人之例，和卓者，即汝教中之汗也，有殺人奪其妻女之理乎？汝教中若有似此者，即非先知 (paihabar) 之子孫矣。霍集占兄弟種種悖教之行，汝等如何猶念之為和卓耶？霍集占、布拉尼敦若誠遵和卓之道，葉爾奇木等四城乃伊之故地也，諸回人何銜恨伊等？眾阿訇、毛拉何不以伊等為和卓乎？念汝為一部之長，諸伯克頭目及助汝理事之人，於此無不知之處。此俱係汝之阿訇、毛拉等無知，但因和卓之名而妄加偏怙議論所致。汝之回教 (hoisei tacihiyan) 雖有異，諒教理亦重利益眾人。汝等今若墮毛拉之言，不獻我之罪人，我必進兵，今年若不能擒獲，即在汝處過冬，明歲再於各處搜討。彼時毀汝游牧、累汝生靈與否，即不由汝矣。毛拉雖有守護教理、不擾生靈之理，若為別部之一二悖教暴虐之人，而致累及全境安良、萬眾生靈，此係阿訇、毛拉利益眾人之行耶？初，準噶爾敗亡之時，亦全不曉此，由惡喇嘛妄行所致。今準噶爾如何，喇嘛等如何，汝未之聞耶？要之，汝為眾游牧之生靈計，若執獻我之罪人霍集占等，汝欲為臣僕 (albatu)、宣力聖主，仰承聖主之威，游牧安寧、眾生安居，皆可無慮，且必得格外恩賞。

hojijan hono suweni ulha jaka be tabcilame yabuha. afara de suweni niyalma be koro arabuha kai. aika meni amba cooha fargame isinjifi gidaburakū bihe bici. suweni badakšan ai gese ombiheni. si meni horon hūsun de nukte elhe oho. olji baha bime. juwe hojo be jafafi mende benjirakū. kemuni amba ejen de hūsun buhe seci ombio. tere anggala yerkim hasihar-i jergi duin hoton. jai ere mudan hojijan sei gaifi tucike hūsun encehen. gemu sini tengkime sarangge. be duin hoton-i ba na irgen hojijan sei gaifi tucike. juwe ilan tumen niyalma be gemu afame gaime mutembime. encehen mohofi hehe juse be suwaliyame udu tanggū

niyalma gaifi ukaka hojijan be. be elemangga jafame muterakū suwende anabumbio. tere cohome suwe daci meni amba gurun de weile necime yabuhakū. meni doro de. weile akū aiman de šuwe cooha dosifi jobobure kooli akū ofi. be teni taka cooha ilifi. doro be akūmbume neneme elcin be takūrafi suweni hojijan sebe gaimbikai. meni amba cooha. ere udu aniya-i sidende. jun gar be mukiye buhe. dergi hasak be dailame dahabufi. wargi hasak. tasigan. burut sebe dahabuha be. suwe donjihakū sere ba akū. be aika suweni jecen de dosifi jafanara be heni sengguwere ba bio. be suweni usin jeku be gasihyabume. suweni niyalma ulha be jocibume jengkekū de cooha dosikakū bime. si elemangga jafafi aliburakū oci ombio. aika šanyan mahala-i ursei nomun de hojo be jafafi niyalma de bure doro akū seci. hojo oho niyalma. suweni nomun de han tere. niyalma be wara. weri hehe be durime gaire doro bio. suweni nomun de inu ere gesengge bici. paihabar-i juse omosi waka sehe kai. hojijan-i ahūn deo hacin hacin-i suweni nomun ci fudarame yabuha bime suwe adarame erebe kemuni hojo seme gūnici ombini. unenggi hojijan buranidun hojo-i doro be dahame yabuha bici. yerkim-i jergi duin hoton cohome ceni da ba kai. geren hoise se. ainu cembe seyeme gasambi. ahun molo se ainu cembe hojo oburakū enculehe ni. gūnici sultanša si serengge. emu aiman de dalaha ambakan niyalma. bek data inu sinde aisilame baita icihiyara urse. ubabe ulhirakū sere ba akū. ere gemu suweni ahun. molo se umai be sarkū damu hojo-i gebu de balai urhume haršame gisurehe ci banjinahangge. suweni hoisei tacihiyan encu bicibe. nomun-i doro gūnici inu niyalma de tusa arara jalin wesihulembi. suwe te aika molo sei gisun de dosifi. meni weilengge niyalma be. mende burakū oci. be urunakū cooha dosimbi. ere aniya jafame baharakū oci be suweni gašan tokso de tuweri hetumbufi. ishun aniya geli babade baihaname jafanambi. uttu ohode suweni nukte efujere efujerakū. ergengge be jocibure jociburakū be suwe enderakū dere. molo se nomun-i doro be tuwakiyame yaya ergengge be jociburakūngge giyan bicibe. encu aiman-i emu juwe ehe oshon-i tacihiyan be fudarame yabuha niyalmai jalinde. tesu aiman-i sain nomhon tumen tumen ergengge be ušabure de isibure oci. ahun. molo ofi. niyalma de tusa arame yaburengge ere biheo. neneme jun gar efujehe fonde. inu ere jergi umai

be sarkū. ehe lama sa balai yabuha ci gukure wajire de isinaha. te jun gar adarame oho. lamasas adarame oho be suwe aika donjihakū nio. eiterecibe. sultanša si geren nukte ergengge-i jalin kimcime bodofi yabu. meni weilengge niyalma hojijan sebe jafafi mende benjibure oci. si yargiyan-i amba ejen de albatu oki seme hūsun bume yabuha be dahame. amba ejen-i horon de niki nukte elhe ojorakū. geren jirgame banjirakū jalin jobošoro ba akū sere anggala. kesi šang ai gese bahara be urunakū sini gūniha ci tulgiyen ombi.¹²⁵

此信《方略》、《實錄》皆未收，因是清朝方面對蘇勒坦沙為數不多的直接回應，故詳加徵引。由於此信是在軍前寫成、發出前並未經御覽，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滿洲官僚階層的觀念世界，其論述邏輯與歷史觀尤需仔細檢視。雖有學者對蘇勒坦沙「先知子孫不可交送異教徒」的教理依據表示懷疑，但總體而言蘇勒坦沙的呈辭仍是純粹宗教性的話語，而富德等人的回應則是在「宗教—世俗」框架內展開。¹²⁶ 在富德等人看來，清軍追剿大小和卓是為安靖巴達克山游牧、解民於倒懸，由「大國」重建被大小和卓擾亂的地區秩序，準噶爾汗國的覆亡以及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歸順清朝是彼時中亞世界極具震撼性的事件，故富德又引之以震懾，援引汗國滅亡的歷史記憶成為清朝中亞外交的常用策略之一。隨後則針對和卓兄弟的「聖裔」身份展開駁論，根據富德等人的邏輯，和卓兄弟雖然在血統上是先知子孫，但其違背了所謂「和卓之道」(hojo-i doro)，在世俗政治或道德層面上已無此資格，易言之，真正可以界定「和卓」身份的是德行、能力而非血統，布拉尼敦、霍集占已非和卓子孫，世俗權力的罪愆消解了其血統上的神聖性，故蘇勒坦沙可不必顧忌教理。在伊斯蘭教教義中，和卓雖然具有表現血統與出身的「表面」與側重知識、行動、內心的「精神」兩種世系 (nisbat)，但一般仍以血統世系為重，即 *Khalifs Abū-Bakr*、'Umar 與非聖裔女子的後裔方可稱為和卓。¹²⁷ 考慮到清軍中有穆斯林精英隨行，不排除滿洲官員有獲得相關教理知識

¹²⁵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札付蘇勒坦沙稿，《錄副》03-0177-1718-032，《彙編》第41冊，頁360-362。

¹²⁶ 浩罕後亦曾以同樣理由拒絕遣送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後裔，但 L. J. Newby 在伊斯蘭教文本中並沒有找到相關的規定，並懷疑這可能是前伊斯蘭時代的遺留，參看 Newby,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p. 26, n. 19.

¹²⁷ Robert Barkley Shaw, "The History of the *Khōjas* of Eastern-Turkistan Summarised from the *Tazkira-i-khwajagan* of Muhammad Sadiq Kashghar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66.1 supplement (1897): 7-8.

的可能，不過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滿洲人藉助其更為熟悉的北亞游牧世界的可汗制來理解天山南路的和卓統治，札文中所謂和卓為「汝教中之汗」(suweni nomunde han) 即是明證。就北亞游牧世界的可汗選任而言，個人能力的重要性超越血統，惟其能發動戰爭、取得戰利品方可獲得部眾的支持，通過強力手段在諸多競爭者中勝出，建立統合各部族 (supra-tribal) 的汗權。即便在汗族之中，繼承者亦須經由類似的競爭選出，而非以出身嫡庶決斷。¹²⁸ 滿洲人對此並不陌生，肇始於雍正朝的秘密建儲制度事實上即含有漢制與突厥—蒙古傳統的雙重因素。¹²⁹ 尤堪注意者，此種邏輯不僅存在於滿洲官員撰擬的札文之內，在鄂穆爾拜使團返回巴達克山途中，霍集斯曾以「同教之人」的身份對鄂穆爾拜做過類似表述：「我輸誠聖主，仍行舊道如常，毫無悖於教義，霍集占、布拉尼敦悖逆天理，毀人生命、掠人女子，種種不可問之惡行，即屬先知（之裔），亦不可容留於教內」。¹³⁰ 滿洲官僚選擇自蒙古文化情境中理解回部，甚至降清的穆斯林精英同樣遵從此套論說邏輯，足可說明由於準噶爾汗國威權的影響，蒙古因素在早期清朝對中亞交涉中成為滿洲人與穆斯林雙方均不陌生的概念工具。而霍集斯家族與準噶爾汗國合作，其人亦具備一定程度的蒙古化，正可以作為滿洲人與中亞穆斯林溝通的中介。¹³¹

富德等人的論述邏輯在文末又回到準噶爾汗國，準噶爾因喇嘛之妄行而敗亡，殷鑒不遠，蘇勒坦沙宜有所悔悟，不必聽任阿訇、毛拉之言。除繼續使用來自蒙古因素的對比外，此處所反映的歷史觀亦頗有興味。高宗在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平定伊犁後即開始建構「西師」歷史書寫的基本話語，其方式有如勒銘紀功之公開表達，亦有詩文唱和之精英層內部的溝通，皆旨在闡揚清朝滅亡準

¹²⁸ Denis Sinor, "The Making of a Great Khan," in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Aldershot: Variorum, 1997), part XIV, pp. 241-258; Joseph F. Fletche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part VII, pp. 236-239.

¹²⁹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407-408.

¹³⁰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摺，《錄副》03-0178-1787-027，《彙編》第41冊，頁143。末句原文為：「uthai paihabar sehe seme inu esebe tacihiyan-i dorgide halburakū kai」。此處「paihabar」恐當作聖裔 (paihabar-i juse omoso) 而非先知本人解。

¹³¹ 霍集斯最初與清朝使者接洽時行蒙古禮，交談亦有可能使用蒙語。參看 Brophy,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p. 243.

噶爾汗國並繼承其領土的合法性。¹³² 此中重要的一環是解釋準噶爾何以衰亡，最早的表述見於平定伊犁同月高宗撰擬的〈告成太學碑文〉與〈勒銘伊犁之碑〉，前者云「噶爾丹策零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殘暴，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後者之表述更為古雅「數世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醒」，要之皆將汗國的分裂與衰亡歸因於噶爾丹策零身後汗統失序與諸汗失德。¹³³ 與此同時，士人群體也接受了這種解釋，並在大量應制詩文中予以強化，如陳兆倫作〈平定準噶爾頌〉云「篡弑相襲者三世矣，達瓦齊酷暴尤甚」；¹³⁴ 錢陳群謂「乃達瓦齊準夷奴孽，篡弑自冒，貪若羆貔，憑陵其黨，分離乖裂」。¹³⁵ 由於御製碑文的權威性以及士人群體的積極回應，此種解釋很快成為清代官私著述敘說準噶爾敗亡的主流話語。不過，富德等人向蘇勒坦沙展示的卻是與之截然不同的另一種話語，且亦淵源有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高宗作〈伊犁喇嘛行〉，云衛拉特崇尚黃教「不過假名敬佛，要乃所以收眾」，噶爾丹策零建立寺廟，「六時梵唄聲無央，塔本吉賽供餼糧，西勒圖者凡四床，膜拜台吉諸宰桑」，亡國之機已伏於此，「其善在此其弊即為殃，喇嘛達爾濟及達瓦齊相繼篡立，無不藉諸喇嘛之力以肆強，逆賊阿睦爾撒納亦結若輩為黨以煽亂。」¹³⁶ 喇嘛確曾在伊犁初定後與對清朝不滿的準噶爾宰桑密謀製造不靖，尚不致動搖大局。¹³⁷ 十九世紀的厄魯特社會有傳說稱西藏僧侶巴勒丹噶布楚格隆（*baldan ṣabju gelūng*）為噶爾丹相地建寺，卻有意選址於惡土（*maṣu ner-e-tei ṣaṣar*），致政（*törö*）、教（*šasin*）崩壞，國

¹³² 關於紀功碑的儀式意義參看朱玉麒，〈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職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中文分冊）》（東京：臨川書店，2014），頁399-410。

¹³³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卷一九，〈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頁166-167；同卷，〈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頁169。

¹³⁴ 陳兆倫，《紫竹山房詩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93冊，據清乾隆刻本影印），卷四，〈平定準噶爾頌（並序）〉，頁58。

¹³⁵ 錢陳群，《香樹齋詩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61冊，據清乾隆刻同治光緒遞修本影印），卷七，〈聖德遠孚準夷歸化膚功迅奏恭紀詩（有序）〉，頁302。

¹³⁶ 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六四，〈伊犁喇嘛行〉，頁314-315。

¹³⁷ 如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定北將軍班第曾奏報沙克都爾曼濟等與眾喇嘛謀迎達瓦齊，參看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卷一五，乾隆二十年六月庚午。關於噶爾丹策零身後的準噶爾汗國政爭史，參看承志，〈阿睦爾撒納「叛亂」始末考（上）〉，《追手門學院大學國際教養學部紀要》8（2015）：44-54。

祚受損。¹³⁸ 此雖屬後代傳聞，未足憑信，但「喇嘛」與「國運」間隱然的聯繫適可說明高宗所論當有其本土的來源。政、教二道均平是佛教時代蒙古社會所公認的理想政治準則，¹³⁹ 但富德等滿洲官員則有意向蘇勒坦沙建構另一種政教失序的準噶爾汗國圖景：教權擾亂政權，最終導致汗國覆滅、而喇嘛亦不得善終。與文首提及哈薩克等部歸降相似，富德等希望通過援引共同的歷史先例來消解伊斯蘭宗教階層的話語權，不過此處的先例已是經過精心撰擬的一種歷史敘述。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準噶爾因素在清朝中亞外交中的重要性不宜過度誇飾。Laura Newby 認為如要突厥系穆斯林接受異教徒作為其統治者，清朝必須建立超越部族的普世治權，效法蒙古、利用成吉思汗後裔的血統為號召，自然是題中之義。此說未免推求過甚，檢覽清與巴達克山交涉的相關文書，清朝從未試圖自蒙古因素中建立其在中亞威權的合法性基礎，相反，高宗對越界用兵的顧慮以及此後對涉足中亞內部爭端的審慎均足以說明清朝並無意於依託蒙古帝國的神話而展拓其在中亞的威權。而巴達克山方面的來文，在文本上亦很難看出突厥—蒙古文化的遺痕。¹⁴⁰ 清朝之援引蒙古因素，毋寧說是基於交涉之便的最基本的考量。準噶爾汗國自噶爾丹時代即西向擴張，巴達克山諸國皆曾為其臣屬，熟悉準噶爾的行政術語與治理邏輯，當清朝進入其並不熟悉的中亞伊斯蘭世界，任用準噶爾舊人、遵循準噶爾慣用的術語與邏輯，遂成為調適滿洲人與穆斯林的便捷途徑，清朝對準噶爾遺產的繼承，亦僅止於這一層面而已，所謂的「普世主義」並不存在。

隨著與中亞諸國接觸之頻繁，高宗逐漸調整治理思路，蒙古因素在中亞外交中的壟斷性地位逐漸淡化，滿洲與中原政治文化因素開始滲入。首先是使者選用，自巴蘇泰、薩穆坦後，清朝未再任用準噶爾舊人出使帕米爾以西，頒敕正使由八旗滿洲內簡派，一般性使節則於南疆伯克內揀選。與西帕米爾伊斯蘭世界外

¹³⁸ 德迪 (degetei)，《蒙古溯源史》(mongyol-un uy eki teüke)，收入巴岱、金峰等校註，《衛拉特歷史文獻》（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頁 324。

¹³⁹ 金成修，〈「政教二道」與 16 世紀末 17 世紀初的蒙古汗王們〉，《*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1 (2005): 159-187.

¹⁴⁰ 如乾隆二十四年蘇勒坦沙謝恩奏表內稱頌高宗為「居大汗之位、討平四方、如 jemsit aiporasjab 之恩綏、如 nemeret 之勇武、磨刀平定一切」（《錄副》03-0177-1752-001，《彙編》第 43 冊，頁 379），不可解之兩詞當為中亞某種語言的音寫，但絕非蒙古語，這一表述顯然亦非來自蒙古世界，或與伊斯蘭教傳統有關。

交的中間人，逐漸由準噶爾人變為穆斯林地方精英。¹⁴¹ 復次是語言，蒙古語（托忒文）在準噶爾汗國時期曾是中亞東部的通行語言（文字），直至乾隆中葉，清朝與中亞諸國的往來文書仍需以蒙語為中介而翻譯，其流程甚為繁瑣：「波斯文 (parsī hergen) 文書俱由阿訇沙阿卜杜拉戈塔爾譯寫察合台文 (hoise hergen)，交毛拉付印房辦事官翻譯蒙文，復譯為滿文」。¹⁴² 但至一七七〇年代，南疆建立了滿語學校，伯克子弟亦有學習滿語文者，正在同一時期，蒙古語（托忒文）作為外交通用語的地位開始下降。¹⁴³ 乾隆二十八年（1763），葉爾羌辦事大臣額爾景額奏稱：「駐邊辦事，理宜愈尊滿洲舊道 (manju-i fe doro)，以清語清文辦理 (manjurame icihiyara)，尤屬切要」，¹⁴⁴ 其動議源自朝廷對新疆官員漸染「漢俗」之憂慮，故於語言強調再三，但另一方面亦可說明，高宗君臣並不希望將滿洲之外的其他政治文化傳統作為新疆行政的主導。至於政治術語與邏輯，直至晚清，清與西帕米爾諸國的關係仍用來自蒙古世界的「主—僕」(ejen-albatu) 以形容，但其意涵則已有較大的變化。在內陸亞洲的情境之中，「主僕」事實上是一種相互的義務關係，具有濃重的保護色彩，弱勢者認可強勢者的威權，則意

¹⁴¹ 乾隆二十五年護送巴達克山朝覲使臣返回並頒布敕書者係侍衛明仁、額勒登額，布魯特侍衛額森隨從前往（慶桂等，《清高宗實錄》卷六〇五，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丁卯，頁 791；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舒赫德摺，《錄副》03-0178-1836-005，《彙編》第 46 冊，頁 379），明仁係鑲黃旗滿洲富察氏、傅清之子，額勒登額係正黃旗滿洲舒穆祿氏（鐵保等纂，《欽定八旗通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卷二七五，〈封爵表六〉，頁 5240；《清國史·大臣畫一傳檔正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據嘉業堂鈔本影印〕，卷一四二，〈額勒登額列傳〉，第 6 冊，頁 836）。乾隆三十三年擬派往調解巴達克山、愛烏罕爭端者為英吉沙爾阿奇木伯克蘇勒坦和卓與葉爾羌桑株伯克摩羅·果帕 (molo guwepa)，參見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永貴、旌額理、額敏和卓摺，《彙編》第 89 冊，頁 88-89。

¹⁴² 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額爾景額摺，《錄副》03-0180-2061-016，《彙編》第 65 冊，頁 315。原文為「parsī hergen-i bithe be gemu ahun ša abdurgetar de afabufi hoise hergen-i ubaliyambume arame tucibufi hoise hergen arara molo de afabufi. doron-i bade yabure hoise baita icihiyara hafasa de mongorome alafi. manjurame ubaliyambufi」。

¹⁴³ Brophy,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pp. 246-247. 阿布賚汗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奏表中稱「此地現無可寫卡爾梅克語 (Qalmaq) 者」，參見 Noda and Onuma,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p. 41.

¹⁴⁴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額爾景額摺，《錄副》03-0181-2067-007，《彙編》第 66 冊，頁 215。

味著要求強勢者對之負責。¹⁴⁵ 乾隆二十四年高宗向巴達克山、博洛爾等國頒敕，三十三年蘇勒坦沙之向葉爾羌求援，皆是基於此種觀念。但高宗對於「主僕」的認知在平定準部、回疆後逐漸發生轉變，其所理解的「主僕」似更近於單向的歸附、順服，清朝並無義務對藩屬國提供保護，當是受到中原政治文化傳統中「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觀念的影響。¹⁴⁶ 就此而言，清朝在處理與中亞的外交關係時，完全秉持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舉凡滿、蒙、漢文化與制度因素均有所參酌，其間並無高低等差，試圖用單一的「滿洲特性」、「蒙古式普世主義」或意涵模糊的「內亞屬性」以總括形容，事實上是無法成立的。

五・結語

清朝向西展拓的一七五〇年代正值中亞地區「霸權失落」的年代，藉滅亡準噶爾汗國之軍威，清朝很快與中亞諸國家、部族建立了外交聯繫，其權力網絡也

¹⁴⁵ David Sneath, *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5, n. 17.

¹⁴⁶ 高宗於乾隆八年、九年所作詩有云「守在四夷吾夙志，干戈絕域息戰攻」、「聞雞起舞壯士心，守在四夷王者道」（分見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19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卷一五，〈詠塞上達蘭海蘭松木皮筆筒用舊題韻〉，頁269；同書，卷二三，〈馬嘶〉，頁368）。乾隆中葉群臣稱頌武功之作，亦有以「守在四夷」立言者，如李因培〈平西域賦〉末云：「萬里開邊，不折一弦，歸德於天，保泰持盈，是訓是行，庶續其疑，恭己無爲，守在四夷，於萬年斯。」參見董誥等纂，《皇清文穎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據武英殿刻本影印），卷四〇，〈平西域賦（謹序）〉，頁241。高宗曾向巴達克山、博洛爾諸國承諾提供保護，謂「別部之人若侵汝，汝示之以敕書，戰事必止；若不止，則差人向葉爾羌諸大人稟明情由」（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新柱、額敏和卓摺，《錄副》03-0180-1993-031，《彙編》第59冊，頁319）。但乾隆三十三年愛烏罕杜蘭尼王朝入侵巴達克山，蘇勒坦沙向清朝求援，高宗卻拒絕干涉，且稱「辦理此等人之事務，惟酌情安撫，斷不可插手其互相劫掠之事。伊等惟圖僥幸，劫掠他人，以求其利，失地後又來求於我，我等豈有爲伊等辦理之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寄諭永貴，第8冊，頁659）這與明人所謂的「夫邊鄙中國門庭也，四夷則籬輔耳，聞守在四夷，不聞爲四夷守」之說甚爲相近，參見《明神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11-13冊），卷二五〇，萬曆二十年七月庚申，頁11366。Matthew Mosca 認爲此事說明了清朝儘量避免干涉外藩事務的外交原則，小沼孝博關於清與哈薩克關係史的研究亦注意到一七七〇年代前後「不干涉」政策的形成，參見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pp. 86-87; 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頁226-227。關於乾隆中葉清朝中亞外交政策之轉折，筆者將另文討論。

藉此滲入中亞，帕米爾以西的大小部落陸續承認清朝的威權地位，由此形成了與東亞世界宗藩秩序所不同的「主僕」關係的政治格局，即高宗所謂「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爲我大清臣僕」。¹⁴⁷ 其中巴達克山歸附對於清朝的意義尤爲重要，二十五年（1760）正月十一日，高宗賜宴巴達克山朝覲使臣，即席賦詩稱巴達克山爲「第一西方足嘉國」。¹⁴⁸ 因其地處天山南路與中亞、南亞次大陸往來的交通孔道，且其送還和卓屍骸，與其他無功而降之部不同，故受到高宗的重視。追討大小和卓事實上是清朝與西帕米爾伊斯蘭世界直接展開的第一場博弈，在高宗看來，和卓兄弟係「我國罪孽深重之賊」，¹⁴⁹ 追討之成敗事關體制；而在中亞穆斯林世界看來，和卓兄弟不僅具有教理上的神聖性，更是可挾以自重的籌碼。

高宗拒絕越境用兵，而傾向於以遣使交涉向巴達克山施壓，此固因清軍兵馬疲乏，難以長程奔襲，¹⁵⁰ 另方面亦可見清朝初入中亞時決策之謹慎與躊躇，高宗並不希望將西陲有限的軍事與行政資源虛耗於外帕米爾世界，「入版圖」的地域僅限於準噶爾汗國之舊土。清朝在此區域內權力與情報網絡的建立，一方面仰賴於當地原有的社會管道，另方面則受益於準噶爾的遺產。就前者言之，需要注意的是諸伯克以及更高階的與清朝合作的新疆穆斯林精英，其社會關係網絡的輻射範圍固不僅限於天山南北路，而在清朝治外之地亦有相當影響。隨薩穆坦出使巴達克山的蘇勒坦和卓頗具代表性，舒赫德曾具奏稱「訪聞蘇勒坦和卓係安集延人」，¹⁵¹ 南疆多有安集延（浩罕）人定居，不知其爲安集延移民的後裔抑或始

¹⁴⁷ 《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諸王大臣面奉上諭，第3冊，頁362。

¹⁴⁸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22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卷一，〈瀛台賜宴拔達山來使即席得句〉，頁266。

¹⁴⁹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富德致蘇勒坦沙函，《錄副》03-0178-1782-005，《彙編》第40冊，頁269。原文為「meni gurun de ujen weile necime yabuha hūlha」。

¹⁵⁰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富德、阿里袞、巴祿、明瑞會奏云：「今回疆 (hoise ba) 事務大定，惟欠執獲二酋而已。進兵與否，惟量力而行，與伊之搪塞與否無干。我兵雖經裁汰，營中所餘並計遣去卡倫殿後者仍有二千。因草場枯槁、馬力甚不如意，實堪煩悶。」（《錄副》03-0178-1785-009，《彙編》第41冊，頁36）原文為「te hoise ba-i baita eiten gemu šanggafī. damu juwe dalaha hūlha be jafara teile funcehe. cooha dosire dosirakūnge. damu ne-i hūsun be bodofī yabumbi. umai ceni andubure anduburakū de holbobuhakū. musei cooha sibšalafī. ne kūwaran de funcehe. jai karun fiyanji de unggihe cooha be dabume. kemuni juwe minggan bicibe. ongko sorofi. morin-i hūsun jaci gūnin de acabume muterakū jalin. yargiyan-i fancahai gusucuhei bi」。

¹⁵¹ 傅恆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五，乾隆二十五年七月戊戌，頁78。

遷之人，但正是移民身份使其成為乾隆時期辦理中亞交涉的最佳人選。¹⁵² 自巴達克山歸來後，蘇勒坦和卓很快得到重用，因「行走甚屬奮勉」賞戴孔雀翎，隨即陪同巴達克山使臣入京覲見，賞戴四品頂戴。二十五年（1760）隨二等侍衛明仁赴巴達克山宣旨，次年賞加三品頂戴。直至三十五年（1770）前後去世前，蘇勒坦和卓始終擔任英噶薩爾阿奇木伯克，輔佐常駐葉爾羌監控中亞各部族的額敏和卓，被清朝視為「熟知周邊地理、各部風俗之舊人」。¹⁵³ 在與巴達克山的交涉中，高宗正是通過任用親近清朝的穆斯林精英以溝通近邊之瓦罕、袞都、什克南等大小部落，逐漸取得其合作，從而對巴達克山形成多方向的管控與鉗制。就後者而言，清朝以準噶爾汗國繼承者的面目出現於中央歐亞東部，準噶爾的人員、語文、政治邏輯與術語均成為溝通清朝與中亞種族、宗教隔膜之中介。但清朝的中亞外交又非先行研究所謂的「蒙古式普世主義」，準噶爾遺產與蒙古因素只是清朝基於實用主義立場所借重的多元因素之一種，隨著與中亞諸國接觸之頻繁，高宗逐漸調整治理思路，蒙古因素在中亞外交中的壟斷性地位逐漸淡化，滿洲與中原政治文化與制度因素也開始滲入。事實上，多重來源的政治文化資源的融匯與共存不僅體現於中亞外交中，也是清代政治構造貫穿始終的特色，用傳統所謂的「中原王朝」或近年流行的「內亞帝國」等簡單的「漢—滿（蒙）」、「東亞—內亞」二元結構來理解清代中國，是很難得其確解的。

（本文於民國一〇四年十月三十日收稿；一〇五年八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¹⁵² 清朝治下首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和什克的情況與此類似。其人出身和闐，準噶爾汗國時期曾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後為避大小和卓之亂而出走布魯特。因其熟悉浩罕、布魯特事務，乾隆二十四年歸降後成為兆惠身邊重要的中亞資訊顧問。參看 Onuma Takahiro, Kawahara Yayoi and Shioya Akifumi,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hoqand in 1759-1760: Central Asia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3 (2014): 393. 傅禮初對其傳記的註釋參看 Fletcher, "The Biography of Khwush Kipak Beg (d.1781),"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part VIII, pp. 167-172.

¹⁵³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永貴、旌額理、額敏和卓摺，《彙編》第 89 冊，頁 88。原文為「ere šurdeme ba-i arbut dursun. aiman aiman-i banin tacin be šuwe ureme saha fe niyalma」。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五車拔錦》，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99-2004，第 1 冊，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曆丁酉刻本影印。
- 《天下輿圖總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妙錦萬寶全書》，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 12 冊，據建仁寺兩足院藏本影印。
- 《明太宗實錄》，收入《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第 2 冊。
- 《明神宗實錄》，收入《明實錄》第 11-13 冊。
-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宮中檔硃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高昌館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第 6 冊。
- 《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影印。
- 《御製滿蒙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 721 冊，據武英殿刻本影印。
-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寫本影印。
- 《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據嘉業堂鈔本影印。
- 萬曆《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據萬有文庫排印本影印。
- 丁謙，《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民國四年浙江圖書館刻本。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彙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大學編，《清內閣蒙古堂檔》，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
- 尤侗，《西堂詩集·外國竹枝詞》，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65 冊，據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 尤侗編，《誨庵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74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王宗載，《四夷館考》，民國十三年東方學會校印本。
- 永瑤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據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影印。
- 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朱鑄禹，《全祖望集匯校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江縈，《四譯館考》，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史部第272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
- 宋濂等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法）杜赫德撰，葛劍雄譯，〈測繪中國地圖紀事〉，《歷史地理（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季羨林等校註，《大唐西域記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段公路，《北戶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589冊。
- 洪邁，《容齋四筆》，收入《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茅元儀，《武備志》，收入《和刻本明清資料集》，東京：汲古書院，1974，第6冊，據寬文四年刻本影印。
- 茅瑞徵，《皇明象胥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史部第10冊，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馬齊等纂，《清聖祖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大紅綾本及故宮博物院藏小紅綾本影印，第4-6冊。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
-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第28冊。
- 梁份，《秦邊紀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 清高宗，《御製文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0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
- 清高宗，《御製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21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
-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22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

馬子木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19 冊，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

盛博編，《宋元古地圖集成》，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8。

陳兆侖，《紫竹山房詩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93 冊，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陳誠撰，周連寬校註，《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陸楫纂，《古今說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5 冊。

傅恆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據武英殿刻本影印。

傅恆等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0 冊。

游樸，《諸夷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742 冊，據明萬曆二十年刻本影印。

萬斯同等纂，《明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31 冊，據清鈔本影印。

董誥等纂，《皇清文穎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據武英殿刻本影印。

圖理琛撰，今西春秋校註，《校註異域錄》，奈良：天理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1964。

德迪 (degetei)，《蒙古溯源史》(mongyol-un uy eki teüke)，收入巴岱、金峰等校註，《衛拉特歷史文獻》，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慶桂等纂，《清高宗實錄》，收入《清實錄》第 9-27 冊。

鄭曉，《吾學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25 冊，據明隆慶元年刻本影印。

錢陳群，《香樹齋詩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61 冊，據清乾隆刻同治光緒遞修本影印。

羅曰鑒，《咸賓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

釋道宣，《續高僧傳》，收入《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據磧沙藏本影印。

鐵保等纂，《欽定八旗通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收入《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17 冊。

“Central Asia Material III: Revelations Regarding Badakhshan.”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9 (1895): 191-196.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et des cartes particulie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edouce*.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6.

- Shaw, Robert Barkley. "The History of the *Khōjas* of Eastern-Turkistan Summarised from the Tazkira-i-khwajagan of Muhammad Sadiq Kashghari."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66.1 supplement (1897): 1-67.
- Ta'Pux-u Бадахшан. пер. с персидского А. Н. Болдырева при участии С. Е. Григорьева. Введ. А. Н. Болдырева и С. Е. Григорьева. Примеч. и прил. С. Е. Григорьева.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7.
- Valikhanof, and M. Veniukof, eds.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 translated by John and Robert Michell.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65.

二・近人論著

巴托爾德撰，加富羅夫編，張麗譯

- 2013 《中亞歷史：巴托爾德文集第2卷第1冊第1部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王古魯編譯

- 1940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上海：商務印書館。

（俄）弗拉基米爾佐夫撰，劉榮峻譯

- 1980 《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向達

- 1987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

朱玉麒

- 2014 〈從告於廟社到告成天下：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重建〉，東方學研究論集刊行會編，《高田時雄教授退職紀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中文分冊）》，東京：臨川書店。

余太山

- 2013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承志

- 2009 《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國の形成と八旗社會—》，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 2015 〈阿睦爾撒納「叛亂」始末考（上）〉，《追手門學院大學國際教養學部紀要》8：41-73。

於福順

- 1983 〈清雍正十排《皇輿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12：71-75, 83。

馬子木

金成修

- 2005 〈「政教二道」與 16 世紀末 17 世紀初的蒙古汗王們〉，
Quaestions Mongolorum Disputatae 1：159-187。

姚大力

- 2007 〈曲出律敗亡地點考〉，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英)約·弗·巴德利撰，吳持哲等譯

- 1981 《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莊吉發

- 1982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陳柱

- 2015 〈拉達克協助清朝擒拿大小和卓考述〉，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八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馮承鈞編譯

- 1956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北京：中華書局。

- 1957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中華書局。

劉小萌

- 2007 《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潘志平

- 1991 《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潘志平、蔣莉莉

- 1988 〈1832 年清與浩罕議和考〉，《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4：87-102。

魏良弢

- 1994 《葉爾羌汗國史綱》，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小沼孝博

- 2006 〈清朝とカザフ游牧勢力との政治的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エジェン—アルバト」関係の敷衍と展開〉，《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2：39-63。

- 2008 〈「控噶爾國」小考：18 至 19 世紀歐亞東部奧斯曼朝認識之一端〉，《民族史研究（第八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2010 〈1770 年代における清—カザフ關係——閉じゆく清朝の西北邊疆〉，《東洋史研究》69.2：315-348。

- 2014a 《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國の辺境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2014b 〈ヌサン使節の派遣：1757 年における清とアブライの直接交渉〉，《アジア文化史研究》14：1-20。
- 小沼孝博、新免康、河原彌生
- 2011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 1848 年兩件浩罕來文再考〉，《輔仁歷史學報》26：107-139。
- 佐口透
- 1983 《18-19 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2012 《新疆穆斯林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松田壽男
- 1970 《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増補版）》，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 野田仁
- 2006 〈清朝によるカザフへの爵位授與：グバイドウッラの汗爵辭退の事例（1824 年）を中心に〉，《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1：33-56。
- 2009 〈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露清貿易とカザフ草原〉，《東洋史研究》68.2：358-388。
- 2011 《露清帝國とカザフ＝ハン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濱田正美
- 2008 〈北京第一歴史檔案館所蔵コーカンド関係文書 9 種〉，《西南アジア研究》68：82-111。
- Adamec, Ludwig W., ed.
- 1972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Gazetteer of Afghanistan. Vol. 1, Badakhshan Province and Northeast Afghanistan*. Graz: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
- Bezhan, Farid Ullah
- 2008 “The Enigmatic Authorship of ‘Tārikh-i Badakhshān’.” *East and West* 58.4: 107-121.
- Biran, Michal
- 2005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phy, David
- 2013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 231-258.
- Chang, Michael G.
- 2007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letcher, Joseph F.

- 1995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ited by Beatrice Forbes Manz. Aldershot: Variorum.

Millward, James A.

- 1998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Late Imperial China* 20.2: 61-98.
- 2007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osca, Matthew W.

- 2013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by, L. J.

- 2005 *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 Leiden: Brill.

Noda, Jin, and Onuma Takahiro, eds.

- 2010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Tokyo: Department of Islamic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ourmamadchoev, Nourmamadcho

- 2014 "The Ismā'īlīs of Badakhshan: History, Politics and Religion from 1500 to 175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Onuma, Takahiro

- 2014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Saksaha* 12: 33-48.

Onuma, Takahiro, Kawahara Yayoi, and Shioya Akifumi

- 2014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Khoqand in 1759-1760: Central Asia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3: 384-408.

Perdue, Peter C.

- 1998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263-286.

- Planhol, X. de, D. Baland, and W. Eilers
1989 "BADAḲŠĀN."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 III, fasc. 4, edited by Ehsan Yar Shat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ossabi, Morris
1975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 Sinor, Denis
1997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Aldershot: Variorum.
- Sneath, David
2007 *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M. A.
1907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teingass, Francis Joseph
1963 *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Including the Arabic Words and Phrases to Be Met with in Persia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ang, Ch'i
1984 "Two Diplomatic Documents From the Khokend Khanate to Ch'ing Empire in the Mid-19th Century."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50 : 1-47.
- Womack, Brantly
2006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ee, Cordell D. K.
1994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hao, Gang
2013 *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 Chinese Maritime Policy 1684-17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馬子木

Qing's Contact with Badakhshan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s Diplomacy towards Central Asia

Zimu Ma

Ph.D.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Khoja brothers' escape to Badakhshan in search for refuge in 1759 brought the situations in the West Pamir areas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Qing empir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Sultan Shah, the leader of Badakhshan, about the extradition of the fugitive Khoja brothers, the Qing court gradually built up their power and informative network, and developed a political relation of "lord-servant" (*ejen-albatu*) with Badakhshan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suzerain-vassal" relation commonly seen elsewhere in East Asia.

West Pamir states differed markedly with the Qing empire in their ethnicity and culture, and the Qing empire at that time did not have the capabilities nor the logistical support to deal with its Islamic neighbors. The Zunghar Khanate, located between the Qing empire and Central Asia, had long ruled the Tianshan region, and made its political culture a mediator between the two. Qing rose in Eastern Central Asia as the conqueror and successor of Zunghar Khanate, and thus inherited its officials and diplomatic assets which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Qing'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However, this was just an expedient. With increasing contacts with Central Asia, the Qianlong Emperor gradually modified his policy, reflecting a decline in Mongolian-style elements and an emergence of Manchu and Ha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Manchu and Chinese archives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s, and by closely examining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Qing and Badakhshan,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how Qing's authority network in West Pamirs was established and what intelligence resources,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cultural traditions were used therein, hoping to thro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Qing-Central Asia re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s world order in Central Asia.

Keywords: Badakhshan, Khoja brothers, diplomacy of Qing empire, Zunghar Khanate